

世界錫的產消與雲南錫業

丁 佶

外交與統一 (下)

王 籟 愚

武漢的迎戰準備

敵國國債的分析

馬 季 唐

由雲南日報說到今後新聞政策

瑞 甫

「合作與經濟建設」

方 顯 廷

日五十月八年七十二
期五第 卷一第
分八幣國

(記登關機政黨請呈已刊本)



本期內容

時事短評

世界錫的產消與雲南錫業

外交與統一(下)

武漢的迎戰準備

敵國一百七十五萬萬圓國債的分析

由雲南日報說到今後新聞政策

介紹章元善著「合作與經濟建設」

丁 恪

王贛愚

馬季唐

瑞 甫

方顯廷

新動向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編輯人 新動向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雲南日報社
發行人 雲南日報社
印刷者 昆明青雲街朝報印刷廠
通訊處 昆明市文廟街雲南日報社轉本刊編輯委員會

訂閱價目

國內與香港：全年國幣一元六角，半年國幣九角。國外：全年美金二元。郵費在內。每期零售國幣八分

本市代售

正中書局、世界書局、生活書店、大東書局、及其他各書店

外埠代售

重慶、成都、漢口、長沙、貴陽、桂林、廣州、香港、各處的生活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

新動向投稿簡章

- 一、本刊文稿，除由本刊特約專家撰著外，並歡迎外稿，性質不論。
- 二、稿件篇幅以自三千字至五千字為準。但有特殊價值之長篇著述，亦所歡迎。
- 三、投寄之稿，望用格紙以鋼筆或毛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文言語體不拘。(請勿兩面寫)
- 四、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五、稿末請註明姓名及通訊處，揭載時署名，由投稿者自定。
- 六、來稿本刊有增刪權，不願者應先聲明。
- 七、稿件登載後，每千字酬國幣二元至五元，或贈送本刊。特別稿件，酬資另訂。若先已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八、未經登載之稿，除預為聲明並附足郵票者外，概不退還。
- 九、來稿請寄昆明市文廟街雲南日報社轉本刊編輯委員會。

倭蘇休戰協定

倭蘇邊境武裝衝突，導源於張高峯。張高峯是必爭的軍事上重要據點。這一句來，兩國用新式武器飛機大砲來爭此一據點。十一日正午十二時倭蘇雙方突然正式休戰，雙方軍隊應駐於十日午夜之原陣地，另由外交途徑來解決界務。現在雙方軍隊仍嚴陣以待。外交談判的成敗，仍視倭方是否肯根據那奉條約而劃界。

倭蘇的邊境衝突，是界務糾紛；而界務爭執的焦點是軍事重鎮的張高峯。倭方在外交上不戰而屈，初提議中止戰鬥，繼提議成立勘界委會蘇倭「滿」三方各為一單位。現在東京居然同意倭「滿」為一單位，派二人；蘇為一單位派二人。倭國不惜自毀其承認「滿洲國」的立場，而把「滿」與倭混為一體，這是外交上的屈服。但現在外交解決途徑前途的荆棘甚多。加俞將軍還在發表主戰的演說呢！

就國際法的立場說：倭蘇十一日協定，是一個休戰協定，不是一個停戰協定。停戰是不再訴諸武力，休戰是談判破裂後還隨時繼續可以打仗。

有一點要注意就是倭國現時不惜屈辱向蘇求和，是陰謀，不是真軟化。這層明眼人一看就知，蘇聯當局自必更能體會。倭寇是最會記暗仇的。一八九五年帝俄干涉遼遼，倭朝野引為奇恥大辱，相隔十年，而有一九〇五年日俄之役的雪恥勝利。又說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的故事，英美合作的壓力使倭退出山東半島。倭代表幣原對我代表顏惠二氏說：東亞事讓白人來干涉，是日本的恥辱，十年後遂有九一八事變。我們盼望蘇聯不要被日本所騙，陷入陰謀，讓牠不久又實現審恥報復的心愿才好。(歧)

「建設」與「建築」

蔣百里先生最近在漢口對記者有一段談話說：「我們這幾年來的建設，經現在一試驗，才被綻暴露了。我老早就說過，我們要真正建設，必須着眼在國防上，南京薩家灣一帶的金碧輝煌宮殿式的大房子究竟有什麼用？天曉得！那僅可以稱之為「建築」，不是「建設」。津浦路過江的渡輪可以說是建設。」

蔣先生這段話，可為中國近年來建設事業下一註脚。其實這幾年來像薩家灣一帶「金碧輝煌宮殿式的大房子」，類的「建築」在沿江沿海一帶正多着呢。筆者去秋在雲南日報的通訊裏——滬戰目擊記——也曾記述上海虬江碼頭，北火車站，上海市圖書館，博物館和上海市政府，先先後後陷落敵人砲火下的慘劇！這些不是中外觀瞻所繫的大建築嗎？虬江碼頭的建築費是國幣三千萬元，未曾舉行正式開幕禮，却先讓敵海軍作運兵碼頭了。北火車站是「二二八」後以七十萬元建築的。但它的效用，據國軍駐滬的某參謀長對滬記者談，上寬而下狹，不堅韌，不適用於防禦用而適為浦江敵砲火的目標。這些是往事，本不應提。然而血的教訓，盡舉使國人不能忘記呵！

現在後方正在大興土木，高談建設。我們願拿過去的事實，警告一般高談建設的人們，請他們要學一點軍事的知識，每項建設，均着眼在「國防第一」的原則上。不然縱然重慶，昆明，……再多添一些宮殿式，羅馬式，的薩家灣一帶的「建築」，也是政府之累，民族之災。(歧)

節約！節約！節約！

蔣委員長曾於七月二十六日發出一個厲行節約的通電，其中有幾句非常沉痛的話：「試一念前綫士兵經歷寒暑，浴血鏖戰，被難同胞廬舍蕩析，流離溝壑，應必食不下嚥，宿不安枕，尙何心肝獨圖宴安



，若復自忘責任，罔顧艱虞，是直喪盡廉恥，何顏居於公職！更何以領導民衆！」又龍主席在八月一日的省府成立十週紀念會上也說：「以昆明市來說，前方雖在抗戰，而本市民衆則依然燈紅酒綠，酣歌恆舞；一般公務人員，穿得好，吃得好，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如此類廢墮落，國際人士怎能不鄙視我們，我們不爭氣，人家又怎肯幫助我們。」我們的領袖我們的長官，對於這樣奢靡之風是多麼痛心疾首，而且認爲不立即糾正不足以言抗戰建國。同時一般民衆對於節約運動，更是如大旱之望雲霓，有文字上的呼籲，有口頭的陳訴。可是在實際上，以我們所看到的，奢靡之風反而變本加厲，在這最重要的抗戰後方，被浮華的空氣粉飾成一個太平世界。

難道我們的同胞都是「不知亡國恨」的「商女」嗎？不是，絕對不是。奢靡之風之所以不能糾正，完全是由於黨政人員的不以身作則，由於黨事機關的不法以繩，嚴格取締。老實說：奢靡之風主要是由上層的領導者釀成的，若上層的領導者一律從儉，老百姓何敢言奢，上行自有下效。富有的外來同胞的增加，固然是增加奢侈的一因，但只要嚴格取締，不見得沒有辦法。現在一般公務人員都喊薪給太低，但我覺得在這抗戰期間，個人生活的困難，不能主要着眼在增加薪給上，而應當着眼在厲行節約上，而節約的能否收效，端賴我當局的決心如何。

國府已於十二日爲厲行節約，已通令全國，「盼全國上下激發良知，深思猛省，一切衣食住行，務循簡樸之原則，無或稍踰，倘有忽視法令，陽奉陰違，一經檢舉，定予嚴懲，決不姑寬」。務望我滇上下，不要把這重大的法令視若廢紙。現在國家已到生死存亡的關頭，一般下級公務人員以及其他勤勞大眾的生活已到破滅的境地，我們還能沉溺於安樂嗎？（惠）

撫恤抗戰將士的幾點希望

魯南抗戰諸役，我六十軍將士，獨當正面防衛，以頑強的姿態摧毀敵人的兇鋒，在我第二次大會戰中，給敵人第一次認識了三連健兒

的英勇，聞風大有阻寒之勢，在全民族的爭求解放史中，寫上瀟灑的光榮的名字。

這種光榮，並不是僥倖取得，而是經過多次的壯烈犧牲與多少人的拋棄頭顱熱血才造成的，一讀政府發表的：魯南抗戰殉職官佐的名錄，更使人感覺到這犧牲的光榮，以及爲爭取這光榮而償付的代價之大。

抗戰正將持續，要生者的英勇地踏上死者的血跡，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必需對死者家屬的撫恤，有周詳的計劃與迅速的實施。

安慰死者即所以鼓勵生者，死者的爲國家民族而壯烈犧牲，固是他所宿願，而毫無遺恨，但父母在堂，子女在室，生活未決，凍餓堪虞！即使死亦尚有令其不能不牽掛者在，人情大抵同然，死者的所不牽掛的，同時也就是生者的所以不能毅然決然的踏上前綫，將個人的一切貢獻給國家民族的理，只要能使死者無所牽掛，生者亦將無所依戀，又何愁生者的不前仆後繼的踏上死者的血跡前進。

對於死者家屬的撫恤，政府非常注意，本省當局更籌集有新幣四百萬元，專作地方撫恤之用，設計至爲周詳，用意更爲優良，不過，我們還有下列希望：

一、勝利的基礎，是由犧牲造成，不拘任何戰役，士兵的犧牲，總比官佐爲多，因而士兵的補充，也比官佐的數量需要的多，故澈底的撫恤，必須從士兵做起，雖然事實上，士兵的撫恤常較官佐爲困難，但爲整個抗戰前途着想，爲的激勵生者的更勇於上前綫計，我們無論如何必需勉爲其難！

二、對於陣亡將士家屬的撫恤，政府自有通盤的籌劃，但我們爲其鄉黨鄰里的人，對於陣亡將士的家屬，更須切實的去盡鄉黨鄰里的義務，所謂「守望相助，疾病扶持」，即使政府的撫恤，一時辦理不及，亦可使陣亡將士的家屬，得免於凍餒痛苦之虞。

三、撫恤與賑災雖有不同，但其需要迅速實施則一，這一點，我們希望政府的將每一次關於撫恤的議案，很迅速的使其見諸事實。

世界錫的產消與雲南錫業

丁 估

雲南每年產錫八九千噸，值國幣一千八百萬元，大部份輸銷外國，佔全省出口貿易總值百分之八十以上，省內直接靠錫的採煉運銷爲業者不下五六萬人。因爲錫業對雲南經濟如此重要，所以錫業常被認爲雲南全省經濟的命脈。

中國產錫，如同產其他金屬如鎢鎳一樣，因爲國內工業不發達，用在國內的數量很少，大部份往世界市場，銷於歐美各國。錫是一個世界市場上的貨物，亦就是經濟學者所謂的一種國際貨物（International Goods），那就是說：這種貨物在世界各市場上的價格，計算了自一市場運到他市場所需的各種成本以後，是趨於相同的。倫敦和紐約都是世界上主要的錫市場，許多年來這兩個市場上錫價的變動都是很一致的。根據袁丕濟先生的研究，雲南箇舊的錫價，折成英鎊後，與倫敦錫價比較，雖然雲南錫價較低，而這兩種價格的升降，極其一致。

雲南是產錫地方之一，世界錫價的變動和外匯的漲落，對於雲南錫業狀況固然有很大的影響，不過我們若研究雲南的比較廣大的問題和牠將來發展的可能，我們應該知道和研究：雲南錫產在世界所佔的地位爲何？世界上有那幾個主要產錫地方？產量若干？主要的消費國家是那幾個？產量若干？他們的供給從何處來？錫的主要用途是什麼？各種用途所消的數量若干？近幾年來世界錫價的變動如何？漲

落的原因何在？主要產錫者前幾年爲統制價格起見，組織了國際錫統制計劃（International tin Control Scheme），這個計劃的內容是什麼？對價格統制有成效沒有？中國應不應該參加這國際統制？我們想增加雲南錫的生產和銷路，應該從那些方向入手？這些問題是本文所擬討論和答覆的，作者希望錫界專家關於本文所討論的問題對作者加以指教。

世界錫的生產

一八七五年以前世界每年錫的總產量不到三萬噸，英國是最大生產者，後來各國工業化增進，亞洲錫礦開發，總產量增加，一八九〇年達六萬五千噸，歐戰期中每年產量達十二萬多噸，戰後錫產一般趨勢仍向上升，一九二九年達到空前高峯的十九萬多噸。該年以後世界經濟不景氣加烈，國際錫統制計劃減限生產，產量猛烈跌落，一九三三年只產九萬餘噸，該年以後因爲需求增加，同時價格上升，產量亦隨着增多。最近十年世界錫產量的數字如左：

世界錫產量，一九二七—一九三六

（英長噸）

一九二七	一五八，七一一
一九二八	一七九，八〇七
一九二九	一九二，一八二

一九三〇	一七五, 九一二
一九三一	一四九, 一七八
一九三二	九九, 三九八
一九三三	九〇, 八五四
一九三四	一一四, 八八一
一九三五	一四六, 八一九
一九三六	一七九, 六〇〇

一八八〇年以前，英國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產錫地方，集中於國內的康臥與得文（Cornwall and Devon）二處，該年以後她的地位漸漸降落，而亞洲的錫產，因為馬來亞及荷屬東印度錫礦業的迅速發展，成爲世界錫供給最主要的區域。英國的錫產由一八七一年的最高量一萬三百噸降至近年來的每年一千多噸。馬來亞的產量由十九世紀初葉的三千餘噸穩穩地增加到一九二九年的六萬九千噸，五六十年來都佔世界產錫第一位。荷屬東印度採錫的歷史，亦很長久，不過進展不似馬來亞那樣快，一九二九年產三萬五千噸，佔世界第二位。後起的產錫地方是暹羅和南美洲的波利維亞（Bolivia），這二個地方的錫產都是在十九世紀末葉纔興盛起來，波利維亞在一九三六年產錫二萬四千噸，佔世界第三位，暹羅產一萬三千噸，佔世界第四位；中國產約一萬噸，佔第五位。更後起的產錫地方是非洲的奈加利亞（Nigeria）和比屬剛果（Belgian Congo）和澳大利亞，一九三六年各別的產錫九萬五千噸，七五二四噸，四三〇〇噸。

世界錫產集中於亞洲，一九三六年亞洲的產量世界總產量百分之

七一·八，次爲美洲，佔百分之二三·七，再次爲非洲，佔百分之二〇·四；澳洲只佔百分之二·四，歐洲只佔百分之二·七。

世界各地產錫量

（以所產錫砂中之錫量爲根據）（單位：英長噸）

亞洲	八八·六五〇	九九·七六六	三三·七九二	九六·四〇〇	三六·五〇〇	七·八
馬來亞	五·三七七	四·一四六	六三·九四〇	四三·九五五	六·八〇六	三〇·三
荷屬東印度	二〇·九二二	三二·三六六	四〇·九〇三	二四·七一九	三三·五〇六	一七·六
暹羅	六·七三七	六·八〇二	一一·〇六〇	九·七一九	二二·六七八	七·九
中國	八·三五七	八·八八〇	六·六六〇	九·三七八	一〇·六六四	五·九
美洲	二五·九八五	三三·三三六	三六·二六三	二六·七六〇	二四·四七五	三三·七
波利維亞	一五·九九九	三三·三三四	三八·一四六	二七·二六八	二四·〇七四	一三·七
非洲	六·四九五	八·八一七	一一·〇〇七	一四·九六四	一八·六六六	一〇·四
奈加利亞	三·七三四	六·三五六	八·六九二	七·〇〇九	九·五五九	五·三
比屬剛果	六	一·〇五九	八·六〇〇	六·四八一	七·五二四	四·二
歐洲	五·五二七	三·三二二	三·四九七	三·〇六六	三·〇一六	一·七
澳洲	七·七〇〇	三·〇二六	一·五五一	三·二二〇	四·三〇〇	二·四
世界總量	二三·七九九	三六·三六六	一五·九三二	四八·八一九	六〇·一〇〇	一〇〇·〇

地質學上，錫的儲藏分爲二種，一種是沖積土的錫藏，採取方法是用水淘洗而得到錫砂，這種錫亦叫作水流錫，（Stream tin）。第二種錫藏是由在地下較深的脈管掘出，叫作脈錫（Mine tin or Lode tin）。在現在錫業上，水流錫是比脈錫重要，生產成本比較低，馬來亞

，荷屬東印度和暹羅所產的錫屬於此類。中國，波利維亞，與奈加利亞的錫屬於鑛脈性質的。

馬來亞採錫機關為數甚多，小的每年產幾噸，大的每年產幾千噸。中國僑民在該地以採錫為業的很多，雖然多半規模比較小，而他們生產總量頗大，在該處市場上很有勢力。荷屬東印度的採錫業組織比較集中，大部份產量出於班卡與必利頓二島(Islands of Banka and Billiton)波利維亞錫業的組織亦比較集中，主要的採錫公司只有五六家，其中以帕提諾(Patino mines and Ent. Cons)與亞拉馬約(Cia Aramayo de minas)二公司為比較重要。

產錫與煉錫

錫砂採出之後，未必就在產砂地熔煉為錫：有許多地方採錫業發達，而未備有充分煉錫設備，將錫砂運到他處去熔煉。歐洲有幾個國家，如荷蘭和比利時，國內不產錫，而設立有大規模的煉錫廠，從他們的殖民地運來錫砂，在國內熔煉。非洲奈加利亞每年產錫砂一萬多噸，差不多全部都運往英國去熔煉。比屬剛果在一九三四年以前，所產的錫砂都是運到比利時去，該年年底纔設立了煉錫廠，而自煉的錫砂只佔總產量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還是運往比利時去煉。南非洲與東非洲產錫砂每年約一千噸，亦大部份運往海峽殖民地或英國意大利等處。南美的波利維亞的錫砂亦大部運到歐洲在英國或荷蘭熔煉。安南的錫多運到新加坡。荷屬東印度產錫砂佔世界第二位，她的產量的三分之一是在境內熔煉，三分之二往外運。一九二九年以前這外運的錫砂全部到海峽殖民地；該年荷蘭在本國內設立煉錫廠，於是荷屬東印

度運往荷屬錫砂的數量年年增加，而運往新加坡的數量年年減少。一九三六年運往荷蘭的數量達二萬四千多噸，而往新加坡去的只五十九噸。暹羅年產錫砂一萬幾千噸，大部份運往海峽殖民地的檳榔嶼。雲南所產的錫砂都在產砂的區域內熔煉。澳大利亞所產的錫砂大部分亦在境內煉成錫。馬來亞不但是採錫最大中心，亦是煉錫最大中心，所用的錫砂除了境內所產的六七萬噸外，還從外面運進二三萬噸，前六七年大部份外來的錫砂是從荷屬東印度運進，近來因為荷屬國內設立煉錫工業，荷屬東印度所產的錫砂多運往荷蘭，而馬來亞所用外來錫砂的來源多是暹羅，緬甸，安南等處，非洲澳洲亦各供給幾百噸。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煉錫的區域分配與產錫的區域分配不同，如一九三〇年亞洲錫砂產量佔世界總量約百分之七十，煉錫數量只佔百分之六十六；歐洲產錫不過百分之二，而煉錫竟佔三分之一。近幾年來因為荷屬東印度原先送往新加坡的錫砂都運往荷蘭去，比屬剛果運往比利時的錫砂數量增加，歐洲煉錫所佔的成分更見增加。照經濟原理講，各種金屬鑛砂應該在產地或在離產地較近的地方煉為成品，比運到遠處熔煉為經濟；不過事實上因為歐洲許多國家原來有煉錫設備，或因為這些國家要把他們殖民地所出產的原料運到國內加工，以求國內增多一種工業，多僱用些人，所以纔有這種把笨重鑛砂長途的運往歐洲去熔煉的一種現象。

英國為壟斷她的殖民地錫砂專供殖民地或本國煉錫廠熔煉起見，在一九〇三年規定凡由馬來亞輸出的錫砂如不是在海峽殖民地熔煉，就要付很高的出口稅，一九〇四年包括英國為免稅輸往地之一，一九

一六年澳大利亞亦作爲免稅輸往地。奈加利亞的錫砂，在歐戰後英國亦規定了一種隨輸往地而差異的出口稅，其目的同馬來亞的錫出口稅一樣，在求英帝國在其帝國區域內能得到煉錫壟斷。

美國國內不產什麼錫，在歐戰的時候設立有二個煉錫廠，煉錫能量有一萬五六千噸，却是因爲不容易找到廉價的錫砂，在一九二四年以後這二個煉錫廠都停止工作了。所以現在美國不自己煉錫，不輸入錫砂，她所需要的錫都是直接由國外購進的純錫。美國對於錫所處的地位就好像她對於橡皮一樣，生產方面她沒有什麼直接關係或投資，而她是個純粹購買者和消費者。

現在世界煉錫業上還是英國佔最大勢力，國內煉錫能量有四五萬噸，加上馬來亞的八九萬噸，一共有十三四萬噸的煉錫設備在英資統制之下。其次要算荷蘭了，國內現在能煉二萬餘噸，加上在荷屬東印度的一萬多噸，共三萬多噸。再其次是中國，佔第三位，每年能煉八九千噸。比利時現在不過煉三千多噸，德國一二千噸。波利維亞，暹羅，奈加利亞雖然產砂不是在中國之上就是差不多，而他們所產的錫砂，都是運到外面去煉。

世界錫的消費

錫消費較大的國家都是工業化的國家，這些國家除英國外多數境內不產錫，而產錫的地方現在工業化都尚落後，所以錫好像許多其他非鐵金屬，生產之後大部份是往世界市場，成爲國際貿易貨品之一。

英美德俄德意日七個國家每年所消費的錫佔世界錫消費總量百分之七十二。美國年消六七萬噸，佔總額幾及一半；英國消二萬多噸，

佔百分之十四。德法俄各消一萬噸左右，各佔百分之六；意大利日本各消五六千噸。中國每年錫的消費大約一千多噸；因爲國內工業不發達，既不產馬口鐵，又不製造汽車，大部份錫的消費恐怕是用在造錫箔冥紙，以供迷信社會祭祖祭神用，把寶貴的富源焚燒養化，由之永久遺失廢棄丟了。別人拿錫去做有用的工業產品，我們拿錫去做鬼神和死人的崇拜用。

近十年各國錫消費的變動，頗能表示各國工業發展的趨向，英美德法是工業化先進國家，十年來錫消費量都維持在一向的高度。日本和蘇俄是工業化新進國家，錫的消費年年上升。蘇俄一九二五年用了二千五百噸，一九三六年用了九千七百噸，增加了差不多三倍。日本一九二五年用三千三百噸，一九三六年用六千四百噸，增加了差不多一倍。

錫的用途很多，單純着用的數量很少，大部份不是加在其他金屬上面做個外層 (Coating)，就是和其他金屬混合成爲各種合金 (Alloys)。單純錫或加少許其他金屬利用的形式或爲裝牙膏油漆化妝品食品藥品及其他化學品用的軟筒 (Collapsible Tubes)，或做包糖菓麵絲牛酪等物品用的錫箔，或作成管子，以運輸啤酒淨水油或其他液體。此類用途全世界每年約一萬七千噸至一萬八千噸，合總量百分之十。用在做其他金屬的外層，最重要的是加在銅版上，作馬口鐵 (Tin Plate)，馬口鐵的用途是做各種食品烟品油漆等物品的罐頭，做廚房用具，玩具，煤氣表，廣告版等。還有一種馬口鐵叫作 (Tinned Plate) 是加上一層錫鉛合金的銅版。加一層錫的銅版可以用在做牛乳釀酒及

其他飲食工業的用具，這種銅拉成線，是一個導電工具。錫用在馬口鐵的製造，其數量在一九三六年約六萬一千噸，合消費總量百分之三十七。做其他外層用去的錫每年大約有五千到七千噸。現在許多國家都自造馬口鐵，日本和印度前十年已開始製造馬口鐵，一九三六年日本的產量只在美英德之下。中國鋼鐵業不發達，到現在還不能自造，每年用三四萬噸馬口鐵，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英美來的。世界馬口鐵消費總量中百分之五十是用在製造各種食品的罐子。

錫的合金種類很多。釐 (Solder) 是錫鉛合金，含錫百分之三十至七十，許多工業，如汽車製造，製罐，電冷器製造，空氣調節器製造，用牠去銲接鋼鐵各種金屬的管線板片。又一種錫的合金叫做錫基軸承合金 (Tin-base or white-base bearing alloys，商名 "Babbit")，含錫百分之九十，其餘為錫與銅，用在做各種機器上的軸承。百鐵 (Pewee) 含錫百分之九十二以上，是錫與錫的合金，用在做款茶或咖啡用的器具，啤酒桶子及家庭裝飾品。鑄字合金含錫百分之三到十四，是錫與鉛錫合，用在印刷業上。青銅 (Bronze) 是銅錫合金，含錫百分之八至十二，有時外加鉛或錳，主要的用途是做軸承，齒輪，傘，硬幣，銅像及建築上裝飾品等。銀錫汞合金含錫百分之廿六至廿九，是補牙用的一種合金。含錫百分之十五至廿五及其他低熔度金屬的合金，因為容易熔化，用在滅火器及火警機的製造上。用在做各種合金的錫；其每年數量約合消費總量百分之四十，用於釐之製造一九三六年計三萬餘噸，用於錫基合金約一萬二千噸，白鐵二千噸，青銅九千至一萬二千噸。

錫的化合物有養化錫，用於玻璃瑯瑯製造業中；氣化錫用於絲的加重及織品染印業；油錫 (Tin oleate)，用作滑油的反養化品。用在做各種化合物的錫，每年約六七千噸。

汽車製造業是一個重要的錫消費者，每年約用一萬四五千噸，一九三六佔消費總量百分之八。此業所用的錫大部份是釐，其餘是錫合金如青銅等。每輛汽車中所用的錫平均約四磅。

全世界鐵路事業每年消費錫約五六千噸，用於機車的四千噸，用於貨客車輛的約二千噸。

美國是最大錫消費市場

美國每年消費錫約六七萬噸，佔世界總額幾及一半，照雲南現在產錫的能量，九年的產量，美國一年之內就可以用完了。因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錫消費市場，同時國內不產錫，是最大的錫輸入國，所以美國錫消費量的分配和錫輸入的來源，我們應特別加以注重。一九三五年美國用錫七萬〇九百六十二噸，其用途的分配如左：

美國錫消費分配，一九三五

(英長噸)

馬口鐵	二八·三〇四
釐	一六·六四六
錫基合金	五·一四四
青銅	四·七六五
軟筒	三·五四八
錫化學品(養化錫除外)	三·二〇五

外層用之錫	二·〇八二
養化錫	一·二四九
鑄字合金	一·〇〇三
其他	三·三八九
共計	七六·九六二

美國所以成爲世界錫消費最高的國家，是因爲牠的工業最發展，同時在幾個用錫最多的工業上亦是美國佔首位，如馬口鐵製造，美國每年的產量是一百六七十萬噸，佔世界總額百分之五十，罐頭食品製造亦是她最大，一九三五年產了一萬六千四百萬箱的罐頭蔬菜，四千萬箱的罐頭水果，二千兆磅的罐頭牛乳品，一千二百萬箱的罐頭魚，一百五十兆磅的罐頭肉。軟筒產量是一九三五年爲三百五十萬羅，一九三六年產四百四十五輛汽車，用錫一萬噸。

美國錫輸入一九三六年共七萬六千零二十九噸，依來源地方分配如左：

美國錫輸入(一九三六)		
來源地	長	百分比
馬來亞	五四,三七一	七一·五
英國	八,四三九	一一·一
中國	四,五八三	六·〇
香港	(三,五五四)	
中國本部	(一,〇二九)	
荷蘭	四,四八四,	五·九

荷屬東印度	二,七三八	三·六
其他各地	一,四一四	一·九
共計	七六,〇二九	一〇〇·〇

近十幾年各來源地的相對地位並沒有什麼大變動，各年都是以馬來亞居第一位，英國居第二位，中國或荷蘭居第三或第四位，荷屬東印度居第五位。

至於入口關稅，美國因爲自己不產錫，所以錫多年都在免稅入口貨之列。

歐洲各國錫的供給

歐洲各工業國錫供給情形不像美國一樣，一則英國國內現在每年尚產錫二千噸，二則歐洲好幾個國家有煉錫工業，主要的如英國每年能煉錫五萬噸，荷蘭二萬噸，比利時四千噸。這些具有比較大規模煉錫工業的國家都輸進錫砂來煉成錫，自用一部份，其餘運到他國。如英國自波利維亞，奈加利亞等處運進錫砂四五萬噸，加上國內自產和國外輸入的錫，減去國內消費，每年還輸出錫一二萬噸。如一九三五年英國輸出錫二萬三千噸，其中一萬三千噸往美國，其餘大部份往歐洲大陸各國。荷蘭用荷屬東印度的錫砂煉錫二萬噸，自用不過一千噸，其餘一萬九千噸中，七千噸往蘇俄，四千噸往德國，三千九百噸往美國，一千四百噸往英國。比利時的煉錫工業是比較新興的，自用只一千多噸，輸出六千多噸，大部份往法俄英美各國。

中國錫在美國錫輸入中還佔第三或第四位，在歐洲各國其地位更低，英荷比三國除了英國還輸入中國錫不到一千噸外，其餘二國因爲

自己都有煉錫廠，是輸出國家，當然中國不易輸入。至於德法俄意四
 個大消費國家，每年各用六七千噸或一萬噸的錫，而他們大部份的供
 給不是來自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就是來自荷蘭與比利時。我們看下
 列德法俄意四國近年錫輸入來源的分配，就可以知道中國錫在歐洲大
 陸地位的落後。

德國錫輸入(一九三五)

來源地	長	噸
荷屬東印度	五,二一八	
荷蘭	二,三一六	
英國	一,〇一九	
印度	八五二	
比利時	八〇四	
瑞典	四七八	
美國	二九五	
中國	一一一	
其他	五三一	
共計	一一,六三八	
法國錫輸入(一九三六)		
來源地	長	噸
馬來亞	四,三〇二	
比利時	一,七四四	
英國	一,五四四	

蘇俄錫輸入(一九三六)

荷蘭	八一六	
荷屬東印度	六五四	
法屬殖民地	六三三	
其他	一四八	
共計	九,八四一	
意大利錫輸入(一九三五)		
來源地	長	噸
荷蘭	七,三四〇	
比利時	一,六〇〇	
英國	二八六	
日本	一七三	
中國	一四一	
其他	一二四	
共計	九,六六四	
法國錫輸入(一九三五)		
來源地	長	噸
馬來亞	四,五八〇	
比利時	四三五	
荷屬東印度	三九九	
荷蘭	三六〇	
英國	二二七	
印度與錫蘭	二二五	

中 國(第十位)

三

其 他 四三七

共 計 六,六六三

共 計 八,二五九

一〇〇・〇

怎樣發展雲南錫業？

要發展雲南的錫業，目前只有靠擴充國外市場的銷售，將來中國工業化了，錫在國內自用的數量可以增加，不過在中國沒有大規模的鋼鐵業，馬口鐵製造，汽車製造的時候，想增加國內錫的消費很不容易，我們只能靠歐美市場來吸收我們大部份錫的生產。中國現在所煉的錫因為大部份成色不合國際貿易的標準，所以不能直接售與各消費地，而須先到香港與些許馬來亞的錫揀冶，由香港輸出。一九三三年以後雲南煉錫公司提高他們產錫的成色，才有一部份雲南錫能直運歐美，不過這成色合於標準而直運出去的錫數量還很少，一九三五年只運出一千多噸，佔該年雲南總產額只九分之一，大部份仍是經過香港重冶，由香港商人售往各國市場。香港錫輸出大體上可以表示出中國錫輸往地分配情形，一九三五年的數字如左。

香港錫輸出(一九三五)

輸往地	長 噸	百分比
美 國	三,七〇四	四五・九
日 本	一,七〇五	二〇・六
中 國	一,〇六一	一二・八
歐洲大陸	九一四	一一・一
英 國	八七五	一〇・六

我們現在要定一個目標，要在三年以內把雲南錫產量和輸出增加一倍，由每年一萬噸到每年二萬噸；如能達到此目標，則雲南錫每年出口值可由一千八九萬元加到三千多萬到四千萬，對於中國對外貿易和國家經濟力量很有幫助，錫業所雇用的人數可以由五六萬人加到十萬人，政府可以多幾十萬元的收入。

怎樣能够把雲南錫的產量提到一年二萬噸呢？這得從二方面入手：生產方面和銷售方面。生產方面，應該把採錫和煉錫的設備擴充，招省外和國外的資本，改良採煉的方法。產量愈增加，機器的使用愈見經濟，同時亦只有加速機械化，纔能够很快的增加產量。採錫煉錫是技術問題，作者不是工業專家，對於擴充生產設備和生產數量的詳細計劃，不能有什麼貢獻。不過知道我們的目標是在增加採煉數量，減低採煉成本，提高錫的成色，使得所煉出來的二萬噸的錫都是成本便宜成色合格而能直接在世界市場上與馬來亞波利維亞荷屬東印度等處所出的錫競爭。不但採煉本身須加擴充與改良，動力燃料及運輸亦應加以研究與改進。採煉所需要的動力，每年數量定亦不少，我們應該研究如何能供給廉價的電力。燃料方面，簡舊附近木炭供給逐漸減少，價格逐漸增高，我們不能設法用焦煤或其他較賤的燃料來代替木炭，或用電力來燒煉爐。此類問題都應考慮和花工夫去研究。

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派二三位對錫的採煉富有經驗，工程學識很高深，富於進取精神的工程師去馬來亞，荷屬東印度，波利維亞，奈加利亞，暹羅等處產錫要地調查他們採錫的方法與技術。波利維亞與

奈加利亞的錫礦與雲南錫鑛情形更相似，應該特別注意。他們亦應該去英國，荷蘭，比利時，海峽殖民地等處煉錫廠去考查他們所用的煉錫方法。這些專家在出發以前應該很詳細的把雲南錫採煉情形和問題研究一下。

銷售方面，我們的目的是要把二萬噸的錫能有利的都賣出去，市價高低我們不能統制，不過我們自己產品成本的高低我們可以加以相當統制。我們的目的不只在增加產量到二萬噸，而在能產出二百萬噸成色合於標準，低成本和其他生產者競爭的錫，這是生產方面的問題。推銷有什麼方法呢？（一）要有完備的推銷組織，我們應當在美國和歐洲設立機關，直接與他們的消費市場接觸。不過只是爲一項貨物而在紐約倫敦設立銷售機關，也許花費太大而不合算，所以應另想方法，這方法是什麼？是設立或組織一個機關，來辦理中國所有主要礦產品在歐美銷售的業務。中國不是每年有很大的錫錫輸出買賣嗎？在紐約不是已經有個設立多年中國人自辦售賣錫錫及其他中國出口貨的貿易公司嗎？我們應該把這三種金屬在外銷售的業務由一個機關來負責辦理，這樣子，每年事務所和雇員的開銷亦能容易負擔起來，同時我們直接銷售的組織亦可以穩固地成立起來了。（二）我們可以與德俄等國接洽，來個「以物換物」的合足。我們目前不是很需要軍火和各種工業生產和運輸的設備嗎？德國每年用錫一萬噸，而其中中國錫只一百多噸，俄國每年用錫亦有一萬噸，其中中國錫只有一百多噸，若是我們能同他們各定個彼此適宜的貨品交換條件，我們很可以拿一萬噸的錫去換他們所做的大炮唐克車飛機和工業機器，充實我們抗

戰和生產的力量。（三）我們應該立刻設立一個錫業研究機關，專門研究世界各國錫產消的情況與問題，分析和預測錫價的變動，研究錫統制問題與生產改良銷售推廣的方法，把所有世界上出版關於錫與錫業的書籍和定期刊物都搜集購定，同時在簡舊應該設立交通設備，時時刻刻直接得到世界錫市場的價格和其他消息。

關於推銷雲南錫的問題，還有一點應該提到的，就是近來中國外匯跌值對於雲南錫外銷的關係。中國外匯現在比戰前已跌了百分之四十，外匯跌值應該有促進輸出貿易的影響，不過能促進多少，要看生產能不能於短時間內充分的擴充，和運輸及其他便利有沒有阻礙。如四川湖北各省的出口貨品，因爲運輸困難，也許輸出數量不因外匯跌值而有大的增加。不過雲南錫出口的路綫在戰事開始後沒有發生什麼阻礙，雖然出碧色塞到海防和由海防到香港和歐美的運費及其費用，現在因爲中國外匯跌值，換算了中國錢，比從前要漲了許多，但是每噸錫運到歐美所花的運費不過佔目前世界錫價百分之五左右，同時國內生產成本不會因外匯跌值而有若何的增加，所以目前中國外匯跌值，正是促進雲南錫出口的好時機，不知道雲南產錫的能量能不能很快的擴充。

中國應該參加國際錫統制嗎？

近十年來世界錫價的變動大要如此：在世界不景氣未開始的前三年，世界錫價就已經開始跌落。一九二六年末倫敦錫價高到三百鎊一噸，自一九二七年初起至一九三一年中間錫價都不斷的下降，一九二九年平均價爲二〇四鎊，一九三〇年春爲一五〇鎊。於是世界產錫者

大起恐慌，設法成立了一個自動限制生產的辦法，以求減少世界錫的存貨，遏制價格的跌落。但是世界錫的有形供給仍在增加，倫敦錫價由一九三〇年初的一八五鎊跌到該年底的一〇六鎊。雲南的錫業亦同樣受很大的打擊。

一九三一年中，生產者對於這局部的自動的生產限制辦法覺得沒有多大效力，於是馬來亞，荷屬東印度，奈加利亞，波利維亞的生產者各得到他們政府的幫助，設立了一個比較完備的強迫限制計劃，組織了一個國際錫委員會 (International Tin Committee)，來統制生產，所統制的生產數量達全世界產量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間。同年八月組織了國際錫合資團，將市場上過剩存錫收回，等候到「市場能夠吸收」的時候再行賣出。同時各生產國用政府力量共同對產量加以限制，牠的辦法是先規定各生產者標準噸數，然後各年或各季再定一個百分數的限額 (Quota)，各生產者在這期內只准生產他自己標準噸數的限額百分數。如一九三一年第一次協定，各生產地的標準噸數，該年的限額百分數為六九·一；一九三二年為百分之四三·七；一九三三年為百分之三三·三。第二次協定修改各地的標準噸數，該年限額為百分之四五；一九三五年為百分之五八·八；一九三六年為百分之九二·五。第三次協定，有效期限為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底，各生產地的標準噸數更定如左：

世界錫統制第三次協定厘定之標準噸數（一九三七—一九四一）

馬來亞

七一，九四〇

波利維亞

四六，四九〇

荷屬東印度 三六，三三〇

奈加利亞 一〇，八九〇

暹羅 一八，〇〇〇

比屬剛果 一三，二〇〇

法屬安南 三，〇〇〇

一九三七年因為世界錫存貨減少，需求增加，價格頗漲，所以限額百分數第一季定為百分之百，第二季百分之百一十。

這生產限制辦法施行以來，對錫價的統制確見效力，由一九三一年三月到一九三二年八月，價格漲了百分之五十，一九三三年中漲到二三四鎊一噸。在該年及次年暹羅，安南，比屬剛果，葡萄牙，英國之康臥亦參加統制。最近幾年來的平均錫價都維持在二百鎊以上一噸，一九三四年的平均價為二三〇·四鎊；一九三五年，二二五·七鎊；一九三六年，二〇四·六鎊；一九三七年初更有增加，最近的價格（一九三八年七月）是一百九十餘鎊。

世界錫統制近來頗受外界的批評，說他們生產額限制得過低，價格維持得過高，而保存了許多高成本低效能的生產者，使消費者出價過高，同時限制錫業本身的發展而鼓勵代用品的使用。「如一九三三年與一九三四年相比，世界的銅鉛鋅錳的消費量都有充分的增加，而錫的消費竟減少了百分之八，也許是由於生產限制價格統制過烈所致吧？」

中國產錫佔世界第五位，而還沒有參加這國際統制計劃，我們應該不應該參加呢？每個生產者都希望他的產品價格能夠維持在有利的

水準上，同時維持價格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各生產者誠意合作，共同謀調劑供給，以適應需求。不過雲南現在每年產錫只八九千噸，同時我們爲求中國產業的發展，對外貿易的順利，我們要在將來的二三年內把雲南錫產增加到二萬噸，所以若是我們參加國際錫統制，恐怕他們決定中國的標準噸數的時候，只給我們以每年一萬噸之額，他們錫業的發展因此就要受了限制了。中國採錫業雖然歷史長久，而用新法採煉仍在萌芽時代，同時在其他工礦業尙未發展的時期內，錫業對雲南的財政貿易及一般經濟關係甚切，當然我們應該培養鼓勵這個產業的發展，而不應當參加國際統制而自投於限制生產阻礙發展之門的。

一九三八年七月，蒙自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1) International T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uncil: Statistical Year Book 1937. London. 6s.

(2) Article on "Metals", 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

(3) Plummer, Alfred: Raw Materials or War Materials.

London: Gollancz, 1937

(4) League of Nations: World Production and Prices, 1936/37

Geneva. 1937.

(5) National City Bank Monthly Letter, April 1937. New York

(6) 雲南概覽，京滇公路週覽籌備會雲南分會。

(7) 滇錄，雲南省教育會。

(8) 四十七年來雲南省出口錫統計冊，雲南省政府。

外交與統

(下)

王翳愚

四、

任何國家，在藉外交以求統一的過程中，實行外交公開是一個重要問題。弱國大半是沒有達到統一的國家，在外交上打破秘密主義，尤爲對症之藥，當務之急。秘密外交是一個國際政治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國內政治問題。從前項意義上說，它是國際無政府狀態下一種必然的副產品，或必要的罪惡。不獨在國力相峙的國家之間常見其風行，即在強弱懸殊的國家之間亦可尋其跡。這種外交利於強國，而不利

於弱國。證諸實際，因爲外交談判於秘密中進行而簽訂協定祕而不宣的緣故，強國仗勢侵凌弱國，便容易避免世界的監視。玉帛相交，干戈即伏，弱國終久是贖武主義的犧牲者。歐戰後對秘密外交活動的防止，已成了和平主義派的信條。這派人士倡議創設國聯，實行登記條約制度，使秘密外交失其作用。此中動機大抵是爲弱國的利益着想。從國內政治上說，秘密外交是政府對外政策與民意完全脫節的一種險惡現象。這就是說在政治未上軌道的國家中，關於對外的措施，

政府假借種種理由，不但事前不讓國民參與過問，而且事後亦不對國民開誠佈公，因而彼此由隔閡而誤會，由誤會而互相懷疑，甚至一國以內發生着對峙反抗的狀態。外交祕密而只限於談判進行上使用的方言之祕密，或者是必要的；若至於祕密而包含着外交方針的隱藏，而不使國民盡量瞭解，充分批評，其爲害實不小了。人們慣說外交是一種極複雜的事，一般人都不懂清楚，應當委諸專家。其實這種說法不過是官僚的口頭禪。關於外交的儀節，手續及慣例等類，或許祇有專門的外交官能知其詳，但若講到與國民計息相關的外交方針，就不見得國民的見解不如那一班專門的外交官。芮恩施 Paul Reinsch 在其所著的『祕密外交』(Secret Democracy (一九二二))中，更進一步主張外交事務與其專靠少數專門的外交官，毋甯廣求公衆的助力。因爲他以爲國際政事有許多不可測算的因素滲雜其間，任何專家不能測其結果，而時常局外人反能貢獻普通見識和判斷，從旁給予外交當局以莫大的幫助。

居今日而談外交，首在確立固定的政策。政策未定之前和既定之後，應該公諸衆論，以求與民意相融合。民意是現代政治的基礎。特別是外交的措施，不論在民主或獨裁國家，均要設法放在民意上面的。法國革命以還，民意與外交的關聯漸見增密，革命人物所揭櫫的「民權主義」，便是後日「人民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理論根據。加富爾憑藉外交手段以統一義大利，亦曾借助於冠冕堂皇的「總投票」方法。當時義大利各獨立公國，先後舉行「總投票」公然表示願意歸併於一邦。加氏曾說：「在藏置於囊中的人民選舉票堆裏，將要

活埋着各公爵，大公爵以及王公等人物。」其命意就是使民意影響到外交問題上面去，以開義大利統一的途徑。歐戰以後，各民族本着「人民自決」的原則，先後舉行「總投票」，以決定國境，姑不問此法的實行果能否代表民意，不過這已够證明民意在國際政治上已有不容漠視的效用了。有人謂祕密外交是專制政治的遺習，少數人壟斷外交政策，拘宥於狹隘的見解，與民意不相接觸。但是到了歐戰以後，民主國家的外交，固然時時刻刻離不開民意的輔助和監督；就是在獨裁國家裏，執政者又何會不假借民意，以增厚外交的力量，甚至有時製造民意，使其對外措施有所依據。德國自希特勒掌權後，屢次把外交上重大事件交付人民裁決；而義蘇兩國雖沒有採行「總投票」的民主方法，可是也會經多次利用人民選舉來做對外的表示。由此可見在任何國家中，民衆在外交上至少可說不是局外人。至論民衆在外交上如何方能發揮其效能，而不阻礙政府政策的施行，却是各國在完成統一的過程中都不容易予以相當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單就國內政治而論，我以爲實行外交公開是促進國內統一的一種最有效的手段。這裏所謂外交公開，不外是說一國的外交政策宜以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方法，隨時盡量宣示國民，使其明瞭已國在外交上所處的地位或所走的路向。我們所要根本打破的不是外交方法的祕密性，而是外交政策的祕密性。但外交方法與政策本難絕對分離，如果政策上已經傾向公開主義，則在方法上也將要減少其祕密性。原則上，施行外交公開之後，民衆既不應直接干涉外交的進行，又不應硬要政府實行某種的對外主張。至於外交政策的得失是非，民衆雖得有參

加意見的機會，然最後決定權及執行權還是要歸屬於政府。在這個意義上，公開外交確有促進國內統一的效用，其理由如下：（一）一國的內政問題，常常牽涉到政黨的爭執，而外交問題大體上不會永久成爲黨爭的焦點。公開外交的主要功用，是使全國民衆對國家在外交上所處的形勢深切關懷，力求規避內部摩擦和衝突，以免貽誤大計。（二）政府盡量公佈對外政策，不特得以避免政府與人民的隔閡，而且可以博得人民的信任和同情。政府在外交上已經盡其職責，縱使不幸失敗，亦可見諒於民衆。政府於外交失敗的前後，若因恐惹起人民的反感，還是諱莫如深，不敢開誠佈公，實爲下策。（三）公開外交是溝通朝野意見的最妙方法。在互相諒解的狀況之下，民衆對外交政策祇作善意的批評，而不作惡意的破壞。在外交上民衆畢竟不完全是局外人，時常依據經驗和思想，還比較當局更適於判斷國家利害所在。所以非依公開方法，勢不能得一健全的，公平的良好外交政策。

我國久懸未決的一個政治問題，可說是如何防止政府行使秘密外交。民元南北分裂以後，國內從未有個能代表民意以辦外交的政府。當時北京政府豈但不能代表民意，反要拂逆民意，不斷的弄出喪權辱國的勾當。軍閥始終甘爲帝國主義的傀儡，自袁世凱以至於曹錕張作霖，如出一轍。他們不但不能了解公開外交的意義，並且也不會領會民衆運動的精神。從「五四運動」起，國內爲對外關係而掀起的無數次民衆運動，其中大半都是民衆不滿政府外交之一種自動的抗議。國民所要求的是痛痛快快的對外國爲整部的算賬，而政府所肯做到的祇是枝枝節節的爲局部的交涉。那時候，政府外交懦弱無能，並不是因

爲民衆不能爲外交後援，實是因爲政府違背民衆意思，遺誤國事。例如，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發生，意義何等重大，而軍閥官僚態度依然是和民衆的呼籲背道而馳。翌年，北京政府因國民黨標榜廢除不平等條約，獲得普遍的同情，乃利用所謂「關稅會議」和「法權會議」之不徹底的辦法來搪塞國人，圖謀規避攻擊於一時，以維持不穩的政權。政府與民衆的隔閡，國策與民意的脫離，是當時執政者實行秘密外交的必然結果。

北伐以後，國民對於政府的信任日益加強，而外交上得力於民衆協助者實非淺鮮。但從「九一八」起，政府對日的外交政策，未曾盡情宣佈，因而使民衆與外交彷彿互相背馳。定計決策固極少徵詢國民（或其代表）的意見，即折衝樽俎亦何嘗引用民力的聲援。所謂「敦睦邦交令」及「維持治安緊急治罪法」等便是在外交緊急時期中政府嚴厲取締民衆過問外交的非常處置。然而，平心而論，過去政府對外交方針所以未便盡量宣露，實因處境艱難，自有其苦衷與理由在。而國人鑒於國難之深，求知政府對策之迫切，也是情有可諒。釐溝事變爆發的前夕，汪蔣二公邀集各界名流，尤其對於外交問題，以談話的方式，作意見的折衝。這種談話會在嚴重的時局中召集，終不失爲「統一意志，集中力量」的很好辦法。最近國民黨臨全代會後，中央根據抗戰建國綱領的規定，又設立所謂「國民參政會」，亦不愧爲在外交問題上政府與人民溝通意見之規模宏大的一個機關。今後中國要實現真正的統一，首先要打破秘密外交。

五、

外交權的集中，是現代統一國家的特徵。在大多數的聯邦國家，各邦政府亦常保留着一部分的外交權，但法律上依然有許多限制。在一個「非聯邦」的中國，以往到處地方政府可以向外國進行外交，簡直是世界外交上的特殊局面。外交權的分裂，在弱國本身上，便成了更大的危機。過去許多不平等條約和非法外債都是由中國境內割據自雄的軍閥所簽訂的。遠事不提，近二十餘年來，日本窺破我國外交權的不統一，在簽約讓權上祇要有人做對手，就不患無法兌現。如二十一條的提出，東三省的地方交涉，塘沽協定的簽訂，以及其在察北冀東的種種行動，無一不是超出常軌的外交實例。在今日的中國，要避免外交上再蹈已往的覆轍，依我個人看來，最有效的辦法顯然是促進外交權的民主化。

外交權屬於行政機關，早成各國的通例。外交是國與國間的交涉，原無權力服從的關係，究與普通行政略有差別。以行政機關的少數人掌握外交權，而不受相當的控制，恐怕難免發生莫大的危險。外交的成敗關係非常重大，揆之情理，似乎不應讓少數人包辦獨斷。然而在從前專制國家中，一切外交問題，多取決於宮廷之間，帝王權位盡其縱橫捭闔的能事，而人民則完全處着被動的地位，對於交涉政策，無權過問。至法國革命後，各國的政治組織逐漸民主化，如選舉權的普及，地方自治的推廣，民選官吏的增額，便是明證。但即令在民治先進的英國，外交權却操着少數人的手中，大部分仍脫離國民或議會的監督。

外交之未早達民主化的緣故，衆認爲人民對外交缺乏興趣所致，

即如盧梭所說：「公民所關切的是國內法律，財產，及個人安全等事，如能使三者充分保障，則對外締結條約等事儘可委託給國家官吏，因最可怕的危險，究非自外而來的。」然平心而論，主要的原因還是外交在性質上之不容易受民主的統制。外交向來視爲一種專門的事業，並非一般人所能勝任愉快的，更不容人民或其代表從容計議的。

大戰以還，一般民主國家已漸次進了國民外交的階段，盡量打破外交上傳統的神祕性，把外交權直接或間接置在國民的監督之下。在原則上，誰也不能否認這種趨向之合理，而實際問題却是怎樣控制外交權，以適應現代民主政治的要求。綜觀各國所採用的辦法，不外下列三種：（一）憲法上的限制；例如，在憲法上明文規定政府行使締約，宣戰，媾和等權，均須得議會的同意。（二）國會間接監督；例如，政府對外締約或宣戰，間接牽涉國家財政，事實上非賴國會的立法行爲，無法進行。（三）政治上的制裁；在責任內閣制下，政府的進退既依國會多數的信任而決定，無形中國會便可左右外交政策了。然從列國過去經驗看來，後述的兩項辦法，失之太不固定，而要實行有效的監督，似乎尤當偏重憲法上的限制，因爲憲法本身的主要作用，就是在確定政府行爲的範圍及其制裁；至於政府對外的活動，自然也不能超越憲法上的限制。所以歐戰後新興國家大抵注重這個辦法，竟然看做實現國民外交的最完妥的途徑了。

近十年來，國民黨厲行一黨專政。我國外交權的運用，因之幾乎完全置在黨的指導之下。舉凡一切政治設施或對外政策悉由黨的機關決定，而交付外交機關遵照執行。在黨治下控制外交權的最高機關，

要算是「全國代表大會」，通常每二年開一次，對外交的主要原則，總得由其決定，交由政府執行。大會閉會期內，則有「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行其職權。然實際上介於黨與政府間而行使此項控制權的機關，就是「中央政治委員會」（三屆一中全會，會改名「政治會議」，二十四年五屆一中全會仍改用此名）。「中央政治委員會」本不能直接發布命令或執行職務，其關於外交政策和設施的議決案均交由國民政府承轉主管院下各部分別負責辦理。除司法及試兩院外，行政院對於外交部處着指揮的地位；立法院處着牽制的地位；監察院則處着彈劾的地位，外交部部長本為行政院院長之僚屬，一切政務當秉承其命令而執行，而行政院院長事實上對於外交行政權之行使，則不得不對「中央執行委員會」或「中央政治委員會」負其政治上的責任。

在訓政時期中，國民黨對於外交權之控制，固為當然的事。前此國內正式代表民意的機關尙付闕如，而國民對於外交當局，除輿論制裁外，沒有直接提出質問，輪替政權的機會。事實上許多外交情形，祕而不宣，誰也不來過問，誰也不敢過問。國家外交之成敗利鈍，全憑黨國要人折衝樽俎，而局外人往往不明真相，心裏難免發生了疑惑，徒使當局變成國民之怨府。過去外交權之未民主化，或者是國內統一大阻礙。

二十五年五月國府公布的憲法草案，關於外交權的規定，際茲外患嚴重期中，尤值我們特別注意的。憲政時期內，政治組織要在實現民主政治，而外交的民主統制似乎勢在必行。按各國憲法上所謂外交權，大抵以便節，宣戰媾和及締約三項權限為首要。暫且撇開使節權

不論，這次憲草中關於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均未予國民大會以複決之權，誠屬一個重大的疏忽。宣戰媾和與一國的存亡和榮辱有莫大的關係，所以歐戰後新憲法對於這項權限的行使，無不加須得民意機關同意之限制。依這次憲草的規定，總統享有宣戰媾和之權（第三十九條），但應由行政會議提出立法院議決方得行使（參照第六十一條第三款及第六十四條）。我們所顧慮的，就是總統既得發布緊急命令（第四十四條），將來遇着自認必要時，宣戰媾和，均有其權，祇須事後三月內提請立法院追認而已。實則戰端已起，立法院不加以追認，還有什麼補救辦法呢？坦率說起來，宣戰媾和何等重大的事件，自應由國民大會作最後的決定，似不可輕易讓許總統或立法院作孤注之一擲。

至於締結條約之權，憲草規定由總統依法行使（第三十九條），但條約案應由行政會議提交立法院決議（第六十一條及六十四條）。這就是說一切條約（連媾和條約在內）均須經此種法定程序始能發生效力，由此直接給予立法院以監督元首締約行為之權。按各國監督外交行政的主要機關，莫若國會。國會本由民選代表所構成，不啻為國家政策發動的總機；而我國立法院純是治權機關之一，以職權論，應依據國民大會所決定的原則而制定法律，說他是立法專門委員會，並非過語。如果欲真正貫徹外交民主化的精神，似乎應在可能範圍內將批准特種條約之權直接委諸國民大會，如此，更能符合「權能劃分」之意。

簡括說來，國民大會，不曾在外國有否完全相類的組織，究其性

質，無非是在憲政時代中，代表民意，監督政府的最高機關，與行使治權的中央政府對峙而立。但在這次憲草中，監督外交之權，不直接歸屬國民大會，而直接歸屬立法院，結果必使代表民意機關形成虛設。就理想上說，到了憲政時期，應該把控制外交權公諸國民全體，但在制度方面所能做到的，只在使國民代表在外交上行使一種監督的權能。目前我們所應注意的仍是怎樣在憲法上對外交權的控制作比較完妥的規定，以求貫徹國民外交的精神。至於國民政治知識的增進，健全輿論的培養，及直接民權的普及，當然更是監督外交的要件，這裏暫不詳論。

六、

現今談我國外交失敗結核的人，往往詰責政府沒有一定的外交政策，當局沒有整頓外交行政的計劃，外交沒有嚴嚴的情報及宣傳，甚至使館沒有充裕的經費。這只在外交設施上指出弊病所在，我們亦望願中央積極補救，不容再蹈已往的覆轍。可是我們要知道外交是處理國際交涉的事宜，究與普通行政大有差別。學識，經驗及技術，兼顧並重，不可偏廢。所以辦理外交尤需專才，始能措置裕如。雖然，現代國家的駐外使節，不得不遵照本國政府訓令而活動；但是，在相當範圍內，尚須隨機應變，發揮手腔，以謀己國的利益。這樣看來，為外交官者，不可無遠識卓見，不可無悠久閱歷，不可無靈活手腕，不可無雄辯天才，又不可無隆重資望。有這樣完全的外交家，折衝樽俎，為國家伸權利，豫警脾應，為國家防不測，實為民族的大幸。我們常說：外交是第二國防，義即在此。前此義大利的統一，當歸功於加

富爾的外交策術；戰前德意志的獨霸，亦有賴於俾斯麥的外交技能。素來外交人才輩出的英法二國，儼然世界政治的總樞紐；目前外交人才缺乏的德日二國，却處處現露着強力的真面目。外交家與國家地位的關係之密切，於此殆可想見了。

我國從未開有所謂培養外交人才。前清出類拔萃的外交家，如李鴻章，曾紀澤，郭嵩燾等，多屬縣吏廷臣，並非專司外交。這班人有機弊的智慧，而無遠大的眼光，主持交涉，往往處着被動的地位，結果節節退讓，少有建樹。民國以還，堪稱外交人才者，仍寥若晨星，以不諳外交的人，授以重責，影響於我國外交陣容，實非淺鮮。近二三年來，政府當局確已留意改革外交機構，整頓外交行政，以及增設外交經費；但對於培養外交人才，迄今尚無通盤計劃，實令人莫解！我國外交界人才的貧乏，確是實情。國人對現任駐外使節，僅可慰勵而不可挑剔，祇宜愛戴而不宜嫉怨。他們辦理外交之有成績，他們周旋壇坫之負盛譽，和我國前途的關係何如，固不待煩言而解。國內才識兼優的外交老手，如顏惠慶，顧維鈞，施肇基，郭泰祺諸氏，中央早已虛懷借重，輻獲社會的同情。然而，政府徒靠屈指可數的特殊專才，而不設法從速培養外交人員，一旦先進倦勤引退，繼起才難其選。就國家遠大方針說來，舍本逐末，誠非得計。或者有人說，外交人才由於天生，本不出自實際訓練。老實說，天才云云，非經磨鍊，無以充分發展；非待培植，祇有完全埋沒。政府果欲坐觀外交天才輩出，是猶緣木以求魚耳。

我始終認定刷新外交陣容，不得不從培養人才做起。原則上，今

後選任外交官應採取人才主義。這裏所謂人才主義，即是說政府應多方選拔外交專才，不宜祇限於某黨某派人物而已。但我國使節升格以來，中央對於人事調動，往往以安置黨內要人及軍界先進為方針，似乎未符「集中人才」的意旨。黨員軍人，固各有專長，令其處理外交，未必都能勝任愉快。以平素毫無外交經驗的人，一旦令其節駐異國，其危險實難預測。在我國看來，外交使節非常重要，於情於理，均當慎重入選，不應有所偏袒，外交的目的，本在謀國家利益。真正外交家，因黨見不同，而至犧牲己國利益，我們絕對不敢置信。總之，我以為大使公使以下的外交官，儘可和其他公務員一樣，依照法規來定其進退黜陟；至於大使公使等要職，則應由國內練達有為的外交人才充任，使其發展專長的能力。外交界門戶之不完全開放，而國內有材之士，便裹足不前，效勞無路，於國於民均屬鉅失的損失。

在「集中人才」的大前提下，培養外交人員的具體辦法大約有下列兩項：

第一：酌量調任下級外交官，以資實地練習。外交官和其他公務員，略有不同，不宜久居一地或安守一職。因為辦理外交，要須通解世界大勢及熟諳各邦俗尚，以講求肆應之術。所以歐洲各國駐外使節，多由輾轉各國，久歷壇坫的外交人員按格陞遷，耳濡目染悉為實際政治，對列國實情瞭若指掌，故臨事無張皇失措之虞。至我國外交官，每長於特殊學識，而短於實際經驗。酬酢疏忽禮儀，貽笑中外；交涉不顧大體，致遭怨謗。這類例證，不勝枚舉。我們為國家備外交人才於將來計，願當局亟應實行轉任下級外交官的辦法。這就是說下級

外交官即是將來的駐外使節，不容令其通曉一國的情形，而必使其轉任於世界各國，以免孤陋寡聞。尤其是久在外部供職的人員，倘屬精壯幹練的青年，當即分別派往各國，以增閱歷。

第二：鼓勵國內人士研究外交問題。現代國際關係，極為錯綜複雜。一國的外交政策，非先精密攷究國際實情，而不可輕易決定。所以外交當局平時應徵聘學者專家，從事討究關係我國的外交事實，尤當在可能範圍內，給予他們以種種的便利。現今先進各國對於外交研究的組織，或由政府直接管轄，或受政府間接資助。究其作用，大半在於培植一般熟悉國際問題的專家。不但研究的結果，可供政府採用，且學識的修養，亦可作人才的儲備。至我國政府對外交問題的研究，迄今尚沒有完整的計劃，誠為憾事。今後刷新外交陣容，鼓勵研究亦不失為一種重要的步驟。

綜上兩點，雖是老生常談，然能認真做去，於培養外交人才一事，定有裨益。外交是弱國救亡圖存的鉅大事業，不是任何部分國人所能擔任起來。以往國民黨在選任外交官上，未曾盡量廣延國內人才，似是一大疏忽。黨內固有不少傑出人才，黨外亦何獨不無？黨員中固多老成持重的外交家，非黨員中又何獨不然？到了今日，外交界倘不完全開放，則國內統一前途無形中必受許多障礙。願當政者其留意之。

七、

在各國國力走向綜合化的世界上，談外交首須把已國的力量放在國際環境中去估計。現實國家既是「力」的單位，國際政治現象又是

「力」，的鬥爭，外交實際上也不外是潛伏國力的表現。一般人往往以爲向來我國固定外交政策的缺乏是外交失敗的癥結。殊不知固定政策的缺乏就是起因於向來我國人對外交之無正確的觀念。鴉片戰爭以前，我國閉關自守，始終以爲與世界可以隔絕。迨鴉片戰爭爆發，各國用強力打開中國的門戶。從此，在國際怒濤中，我國竟成了列強互鬥的對象。但最可怪的，就是辦外交者處這種形勢之下，還抓不住國際間「力」的表現之重要性。一時士大夫，如左宗棠，李鴻章者流，雖主張籌辦「洋務」以自強，然他們仍不能了解外交與「力」有若何密切關係。當日的中國所走的外交路向，不是榮譽的孤立，却是危險的孤立。甲午年的中日戰爭打破了我國人孤立的迷夢，聯俄失望又轉求聯日。此時弊端，又是過分重視外援的重要，而忽視了自己的國力。直到歐戰開始以時候，我國政府仍不能消除倚賴的心理，所以請求美國代保本國沿海口岸，租界，租借地的中立。這種請求卒被美國拒絕了。「一九一八」以後，我國並不究國際政治的複雜背景，又完全倚賴國聯的力量。嗣因國聯調停失敗，國內人士竟有主張放棄促進集體安全的努力，而恢復已往危險的孤立政策。其實這是何等重大的誤解！

在休戚攸關的國際社會中，高唱孤立主聲是違反時代潮流的攪動。中國問題早已成了世界問題的一部分，同時世界的政局又和中國地位有密切關係。我們對外定策決計，首要認識「力」在國際政治上所佔的重要地位，要把已國的力量放在國際競爭中通盤計算。自己的力量，固不可忽視，別人的力量，亦不得不注意。從外交上說，所謂「自

力更生」，既不是完全的排外，也不是盲目的排外。實是說認識國際，認識自己，一國人祇有共同維持國內統一，俾使力量集中以爲外交的後盾。要憑藉外交手段來破壞統一，已爲今日時勢所不容。一個國家真正統一了，絕不因援用外力之故，而致政治發生波瀾，形成分裂的局面。

抗戰開展以來，國人都瞭解運用國際策略的重要性。站在本國利害的立場上，極力聯絡與國，孤立敵國，不但要在世界友邦中接受道義的同情，並且要取得實力的援助。這樣一來，我們必先在外交上發揮獨立自主的精神，對抗戰又須表示堅定不屈的決心。現代國交大體以利害異同爲依歸，鮮有以主義異同爲標準。平時如此，戰時亦如此。

一個民族，在臨大難歷萬劫中，祇要深自猛省，祇要奮發自勵，而不應苟且偷安，更應頹廢喪氣。我們常自最是同化力特強的民族。同化力的特強，固然是歷史上的事實，但到了今日，我國受異族的侵凌，一天比一天劇烈。我們若使還以爲同化力特強的民族決不至於滅亡，實不過於憂愁困苦之中聊作自解而已。殊不知今日侵略我國的外族，絕非往昔外族可比。前者爲世界上文明較高的強國，而後者僅是東亞文化較低的異族。挽救垂危的我們民族，當然要振起民族自信力；然振起民族自信力，絕對不是妄自尊大已往的光榮，而是積極培植足以啓人信任的實力基礎。我們與其說現今我國的「力」之不如人，是起因於外患的侵迫，不如說外患的侵迫，是起因於現今我國的「力」之不如人。在滅國亡種的危機中，民族自信力與民族誇大狂，豈容混爲

一談？

從外交上說，所謂民族自信力，就是說：一個民族抱着捍衛國家人格，維護國家主權，及保持國土完整的莫大決心；縱使自己是一個弱國，但不特不肯示弱於人，而且還要遠勝於人。祇要能改進已國的環境和地位，雖赴湯蹈火而不辭。在這項意義上，民族自信力無非是人類最高尚且最純潔的愛國情緒，其表現於實際政治者雖常不免流於狹隘，然任何民族無自立自助的精神，終久必為他人所吞滅。事實上

武漢的迎戰準備

一年來，政府當局在迎戰準備過程中留給我們的主要感想是：（

一）外交工作，費力不少，舊的國際路線在繼續延長之中。新的國際路線，正在不斷的向前展開，今後民族命運，大部分要擺在這條路線上去秤量輕重的。（二）軍事工作，積極布置，軍隊的數質，都在高速度度的改造之中。十三個月以來的成績，證明我們新生的武力，也能够和現代化的敵軍展開現代的戰鬥！損失雖大，教訓雖苦，利害品迭，我們總算在進步。（三）民衆動員的工作，還不能配合軍隊的動員。政治的工作，也趕不上軍事的發展。（四）後方沒有和前方打成一片，全國精神總動員的工作，還缺乏最低限度的成績

由於第三期抗戰前途的嚴重和武漢的危急，我們的負責當局，已經從新下了一番決心，就是說，從最近起，一切軍事的部署政治上的

，由於民族自信力的激發，戰爭往往是不可逃避的結局。當然，這種戰爭，不是征服戰爭，侵略戰爭，而是反抗戰爭，解放戰爭，自有其神聖的價值在。

世界上窮兵黷武，固然終久要失勢；不過妄想和平者，大致都是時代的犧牲者。現今談外交，忘不得「力」有最後的決定作用。培植「力」的基礎，必定先從促進國內的統一做起，這是無可疑義的。

一九三八、七、十五、於昆明

設施，都要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做去。公文，條例，繁雜的組織，人事的牽掣，各種各樣傳統式的官僚式的作風，都一律推翻，沒有個人的恩怨，只有國家的存亡，非這樣作，就不能夠澈底，就不能打仗。

我們應該擁護在「軍事第一主義」之下，一切都迅速地集中在它的指揮和統制的範圍內。

看吧！敵人的鐵蹄，已經衝破了湖北東面的門牆——黃梅，侵入廣濟，距離漢口不過一百四五十公里。「吃緊」與「危急」已不能形容今天的武漢，問題核心，不在敵人如何的猛攻，而在我們用什麼力量迎戰，用什麼力量粉碎敵人的陰謀？答案的根源，不僅擺在軍隊裏，而且把它擺在民衆裏！瑪德里就是鐵的模範。

爲了適應這要求，保衛大武漢「總動員委員會」，總算在最近成

立了，要不是蔣委員長的手諭，還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有消息。雖然成立時間太晚一點，但願它很迅速地誕生成長，發揚，不要成爲公文中的「機關」，一定要督促它成爲人民羣衆中間的，「戰鬥集團」！

武漢衛戍總司令部政治部，最近十天來，已經在組織青年，學生，工人，婦女的各種民衆團體，準備作爲保衛武漢的第二綫生力軍。分別担任各種「交通」「情報」「偵察」「運輸」「慰勞」「宣傳」「歌詠」「救護」「醫藥」……的戰地工作。

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已準備擴大「保衛大武漢」的宣傳運動。行將來臨的「八一三」週年紀念，就是它們發展工作的一個好目標。此間的各大報紙原已決定隨政府機關相機撤退，現在因爲武漢三鎮的老百姓都要動員起來了，難道指揮輿論供給「紙彈」的精神戰鬥員，還忍心先走嗎？聽說「大公報」「掃蕩報」「武漢日報」等，都準備不惜作最後的犧牲。八路軍的機關報「新華日報」更決心撐持到最後一天，必要時編隊，工人，再隨着最後一批軍隊撤退。

在九江揭開第一幕在宿松揭開第二幕的所謂「第三期抗戰」，它的前途一定會在江西戰區作敵我雙方的「主力消滅戰」，在湖南戰區作「主力的殲滅戰」。——最終的目的却在爭奪大武漢。

所以，我們從軍事學上斷定敵人爭奪大武漢的第一個冒險戰略是主力的「中央突破陣綫」。此而不行，再來「兩翼迂迴陣綫」，再不行，則採「西路大包圍陣綫」。——這幾天敵人軍事表現，更證明了敵人的中心戰略，已經正式採用了「中央突破陣綫」中的「江北主力綫」——這是敵人沿江躍進從廣濟包抄田家鎮沿公路直攻漢口的

最毒辣最捷便的一條路。

爲了要擊破敵人的這種陰謀，我們的第口戰區司令官兼武漢衛戍區的總司令，口口將軍，特於數日前由戰地趕回武漢，在口口參加「最高軍事會議」根據許多新事實。從新商定了一些更具體的迎戰準備。會議結束，大批將領分別回防，而口口將軍，却又帶病趕回前線。這種精神，真值得我們感動。特別是他這回重到前線後，又拍電回武漢，調用大批青年幹部，速往前線發動政治工作。更給了苦悶在武漢的一般青年男女一種深深的刺激！是的。這兒的青年羣衆，對於口口將軍正滿懷着熱情的嚮往和遠大的期待！人人都盼望口口將軍在不遠的將來，就凱旋武漢！因爲他能成功，大武漢就有辦法。

一月以前，敵人的戰略，顯然要同時展開各路敵軍來大包圍武漢。雙方勝敗的關鍵，都在武漢的「外綫」武漢的「門戶」。所以我們對於武漢四周的布防，似有極少部分不能配合眼前的需要。因爲我們的軍事當局，已經看準了敵人最近的企圖。是全力挺進直探虎穴。所以武漢近郊地帶的決戰。恐怕勢所難免。

前幾天，敵人又在東京上海發出荒謬無比的廣播。說我們武漢人民已經正式動員了，就算是「戰鬥員」他們就要施行大規模的轟炸。爲了這事，我們的負責當局，會根據國際公法，發出反駁的聲明，希望國際人士不要爲暴日烟幕所迷，同時衛戍總司令部又特別發表告武漢市民書，嚴辭勸告一般市民，尤其是老弱殘廢，青年婦女，少小孩童等等，迅速地離開武漢，向西南的安全地方撤退，第一是避免在敵機下作無代價的犧牲，第二是避免在必要時影響正規戰鬥員的活動。

這些，都算是我們迎戰準備的另一面。

當英大使卡爾氏離漢赴港前，曾分別訪問我軍政最高當局及朝野各黨負責人。他會見蔣委員長時詢問戰局的情形，蔣委員長的答覆很開明「沒有問題，我們對於保衛武漢，很有把握」接着他訪問陳誠將軍。陳將軍對這位友邦大使的關係，更說得直率而痛快「就是沒有把握也得打！何況……」後來，他又會着軍政部長何應欽氏，英大使更懇懇詢問我們的迎戰準備。最後他留給我們一句頗費解釋的參考「……到九月中旬的時候，……」

某國駐華大使館的武官某氏，前兩天會見我們的何應欽部長，也說了一句近乎星卜的戲言「過了八月底就有好辦法」

我們相信關於這些時間方面的「數字」也許不難成爲未來中倭戰史上有趣的記載。

但「時間」像流水樣的過去，「危機」像暴雨般的襲來，我們距離「八月底」或者「九月中旬」都算不遠。可是這一段不遠的路程，却是虎豹縱橫荆棘遍地的險惡之路，願大武漢真正怒吼起來，爭取這可貴的「時間」可貴的「數字」！

八月六日（國民公報通訊）

敵國一百七十五萬萬圓國債的分析

馬季唐

在敵人的「速戰速決」一夢幻被打破以後，長期侵略戰正掉轉進行的當中，筆者嘗試了這篇小小的分析。因爲本篇脫稿的時期是遠在兩月以前，所以沒有能把最近敵國國債的發展情勢分析在內；可是，幸而本稿的內容還不受時間性的限制，似乎不致於使讀者有明日黃花之感。因此筆者不揣冒昧即以原稿獻拙，也許能助讀者對於認識敵情作一參考的吧。至於關於最近兩月來敵國國債的分析，容日後另稿述之。并希讀者諒鑒。

筆者附識，一九三八，八，三，

二十二日路透電消息，敵人一九三八年度的國債（註一）累計總數將增至一百七十五萬萬圓之多。這一筆龐大的國債，其增大的過程與內容如何？敵國內人民的負擔能力及消化能力如何？增發後對於一般國民經濟的影響又如何？我們試略加以分析，以作檢討敵國財力是否能支持此長期侵略戰的一個解答。

（一）序言

敵人自以武力侵略我東北四省以來，由於銳意擴充軍備的結果，其財政的支度，早已每年都要依賴赤字公債的發行來維持。而迄至侵略戰開始後，公債發行，日益增多。據三月二十四日雲南日報中央社

（註一）這裏所謂的國債，是指狹義的國債而言。即專指日本中央政府所發行的公債，其他如大藏省證券米穀券及地方公債不在內。

（二）敵國國債增大的過程

日本國債增大的過程，我們可以日本對外幾次佔便宜的勝利的戰

爭爲分界來看。大概是每經一次戰爭後，日本國債必然增大一次。——固然，日本國債增大的原因，並非純由戰事的發動。

在中日甲午戰爭（一八九四年）以前，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年）三月末（以下各年均係三月末）的日本國債，不過二四六百萬圓。甲午戰後（臨時戰費爲二萬四十七萬餘圓）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年）的國債，增爲三八三百萬圓。五年間約增大百分之五六，所增程度尙微。但至一九〇四年日俄戰後（戰費一，五〇八，四七〇萬圓，此外事件關係費屬於一般會計者計二二一百餘萬圓）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年）的國債，一躍而增加到二，二五四百萬圓，即十年間約增六倍。更經歐洲大戰後，（參戰費八八一六六萬餘圓，此外事件關係費屬於一般會計者計六五〇〇〇萬圓）於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增大到四，〇七七百萬圓，即十五年間約增二倍。其後，昭和元年（一九二六年）增加到五，一七二百萬圓，至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三月末止，總計國債爲六，一八八百萬圓。前五年間的增加爲百分之二二六，後五年間的增加約爲百分之一一九·六。增加率之低，可以說爲從來所未有，考其所以然者，全國財政大臣高橋是清，井上準之助輩財政政策的根本方針爲緊縮主義，所以公債政策以不募債爲原則，公債之發行，自然不致激增了。

及昭和六年九月東北事變（事件關係費一般與特別兩會計至昭和九年度爲止，合計七萬二千萬餘圓）後，一方面因爲日本經濟不景氣的深刻化，致財政收入急激地困難起來；他方面因爲連年軍事費之擴大，財政支出日愈增加，收支上遂有鉅額的「赤字」公債之發生。爲

填補此項赤字，不得不放棄一向不募公債的政策，而增發巨額的赤字公債。所以昭和七年以後，國債差不多無一年不在激增中了。我們可以由左列一表看出昭和五年以後，各年發行公債數額及累年國債總額。

年(各年度末)	公債發行額	一般會計(1)	累年國債總額(2)	增加率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	三八,〇〇〇	千圓	五,九五五,八二六	千圓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	一一〇,二七三		六,一八七,六一〇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	六五九,五九三		七,〇五〇,一九五	一·一六
昭和八年(一九三三)	七五三,〇三八		八,一五九,〇三八	一·三一·五
昭和九年(一九三四)	七四二,五四二		九,〇〇〇,四四四	一·四七
昭和十年(一九三五)	六七八,三七一		九,九五五,三〇〇	一·五九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	七〇三,八三八		一〇,五五五,〇五八	一·七一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			一〇,五八〇,三三一	

註(一)數字根據昭和十二年版「朝日經濟年史」昭和十年度止爲決算，十一年度係實行預算。

(二)數字根據同盟社編「時事年鑑」，昭和十三年版，一八六頁。

但又據同年鑑二三五頁「公債公司債現在額」(各年末一項所載數字如左：

昭和十年末	一〇,〇〇二,三九一	千圓
昭和十一年末	一〇,八一一,六七三	

所錄兩種數字，何以不同，無從證明，姑轉錄之，以備參考。

昭和十二年馬場藏相提出了空前未有的三十萬萬餘圓的龐大預算，經過結城藏相的修正，結果議會決實行預算總額為二八，七二一〇萬圓。此中公債發行額一般會計項下為八二二〇萬圓，特別會計項下為一四三〇萬圓，共計九六五〇萬圓餘圓。但尚未及年度的中途，豫溝橋事件即起，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因此，在七月二十六日的特別會議裏通過了昭和十二年度追加預算（主要是所謂『北支事件關係費』，而此項事件費一般與特別兩會計共計五・二七二六萬圓），合計一般會計總額達三四・〇九二八萬餘圓，此中公債發行額合計實為一三・七一五七萬九千圓（內『北支事件費』公債共四萬六千二百十二萬八千圓）。

繼以上海事變發生，戰爭擴大，敵內閣又奏請天皇召集臨時會議，遂於九月四日舉行會議，又通過了臨時會議的追加預算案及臨時軍事費預算案。臨時軍事費預算額不過四二六〇萬圓，追加預算歲出總額計二〇・六五二七萬圓。而軍事費的財源，則全部仰之於公債。

上述特別與臨時兩議會所成立的十二年度預算總額，合計實達五四・七四五六萬圓，此中直屬於戰費者為二五・五九八六萬圓，已為敵國前所未有之龐大戰費。然而，十二年度預算總額中，決定以發行公債為財源者，有臨時議會通過之臨時軍事費及特別議會決定之公債額兩項，合計十二年度公債發行預定總額達三三・九四二五萬圓。因此以若十一年度末之國債為一〇・五七四〇萬圓，則十二年度末之國

債將必為一三，九六八〇萬餘圓。然而公債的發行額不能為一般金融所消化，（原因見第四節）結果遭受了極大的限制；所以去年預定的發行額十五萬萬圓，除銷售攤派了不滿五萬萬圓外，大部份還留存於日本銀行。

今年二月二十八日，敵國第七十三屆議會，又將昭和十三年度的預算通過了。經常歲出預算為二八・六七七九萬圓（內軍事費十二萬四千萬圓），特別預算（侵華追加戰費）計四十八萬五千萬圓，內海軍部項下一〇四三百萬圓，陸軍部項下三二五七〇萬圓，財政部項下五萬五千萬圓）兩共合計七七・一七七九萬圓之鉅，竟開敵國龐大預算劃時代之新紀錄。可是形成這樣鉅額的預算的財源，仍不得不仰給於公債。經常預算中，公債發行額計六九四〇萬餘圓，而為特別預算發行之公債，則計四四三〇萬餘圓。兩共合計發行公債五一四七〇萬餘圓。因此假定前述十二年度末之國債將為一三九六八〇萬餘圓。現又加計十三年度之五十一萬萬圓公債，則十三年度末（即至明年三月止）之敵國國債將為一百九十一萬一千五百餘萬圓。但事實上，十二年度的公債，并未照原額發行，大概至少還剩十五萬萬圓之譜，所以十二年度末的國債約在百二十萬萬圓左右。但是十二年度必須發行而未發行之公債約十五萬萬圓之譜，勢必順延至十三年度中發行之。如此，十三年度的公債發行額除去年未發行者外，還須加上本年度的五十一萬萬餘圓。所以中央社東京四月九日路透電（載大公報四月十日第三版）中有『日本因中日事件與其他需要，在未來十二個月內，將發行公債六十五萬五千七百萬圓。』

這個將要發行的鉅額公債，是否能如數發行完了，容後說明。總之，敵國十三年度末的國債累計額將達一七五萬萬圓之一估計，可以說是近乎事實的說法。

這一個一百七十五萬萬圓國債的增大過程，既已明瞭，我們還須由靜的方面，去分析其構成內容，藉以明瞭其國債之意義和作用。

(三) 敵國公債之內容分析

日本國債的內容，可以由舉債的對內或對外，分配用途及所有者各方面加以分析之如後：

第一，由內國債與外國債的區別來看，昭和十二年六月末的國債總額一百〇五萬八千萬圓中，內國債為九・二六四萬圓，佔百分之八七・五，外國債有一三・一五六〇萬餘元，佔百分之一二・五。內國債償還期限，由昭和三十五年至六十年為止，其中以四十八年（一九七三）以後，到六十一年間的償還數額佔多數。外國債的償還期限，由昭和二十二年至四十五年為止。而外國債中，欠英國者，有七九三七〇萬餘圓，佔百分之六〇・三，欠美國者為三萬六千餘萬圓，佔百分之二八。欠法國者有一萬六千餘萬圓，僅佔百分之一一・七。這些外債，大多是大正明治年間借來的。最近祇是昭和五年借了二六四萬餘萬圓的英美外債。但現在要想由外債來彌補今後將發行的公債，似為各國所不許。今年初會一度謠傳日本將向美國摩爾根借款五千萬美金之說，以及向美政府交涉九千萬美金的棉花借款，皆未能成爲事實。似此，今後將發行的公債，也祇有以內國債填補之一法。

（附註）發行內國公債與外國公債，有什麼不同的意義呢？有人

說以公債來度支戰費，是因為想減輕現在人的負擔，把公債利息減債基金的支付與元本的償還等費用的負擔，來加之於後世人。其實不盡然。因為政府舉內國債來籌集戰費，以購買軍需品及其他物資勞力，作戰時一切設施的消耗，事實上就是當時的國民失去了同樣數量的物資勞力，亦即是當時國民的負擔；而隨後公債本利的支付祇是代表國內購買力的移轉，不致再產生國民的負擔。因此我們可以說發行內國公債仍是增加國民負擔的一種辦法。但是外國公債則與此不同。外國債是取得外國物資與勞力的手段。那末，取得勞力物資於國外，便是國內增加了物資與勞力。物資與勞力既然增加，國民在當時就不必去負擔這些增加的部份。不過這些物資與勞力（即外國債）到將來是要附着利息償還外國的，這便是在將來的負擔。所以外國債的負擔力可以說留之於後世人，而內國債的負擔，則是現在人的責任，其意義不同。

第二，我們應由債的目的來看日本國債的分配用途怎樣。茲將昭和十一年三月末的國債列表以說明之：

目的	用途	舉債額	百分率
制度變更	諸	九二・六六四千圓	〇・九四
敷設鐵道	分	一・九九九・九七八	
築港，疏水，道路開通	發	三三・七九五	
採鑛製銅電訊		2.313.773	一三・四八
及電話擴張等			
軍備擴張		七八・八二五	
戰爭及事變		二・五九七・七五六	二六・一六

紙幣銷毀	一〇・〇〇八	
國債借換	三九五・六二三	
紙烟及鹽專賣	一九・九四一	
行政調整及軍備限制與整理	一一七・〇二六	542・598
整理財政		五・五
復興事業	六八六・九四八	六・九七
震災復興及復舊	四九四・二四九	
朝鮮	一二六・八九一	
台灣	三五・七三八	
樺太	五・四〇八	六・七一
關東州		
拓殖事業		661・986
匯兌資金疏通等	三八七・六三八	
對華借款關係三銀行債務整理	一二六・六四七	
震災票據損失補償及善後處置	一四九・二五二	
台灣融資損失補償	一八四・九九四	
系價安定	七九・五九八	
英鎊	八・一四五	
業債券匯兌差損補助費		九・五
歲入填補	一九四三・一六三	一九・七一
總計	九・八五四・三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數字根據前引「時事年鑑」一八六頁

由上表我們可以很明白的看出，昭和十一年三月末止的日本國債中，百分之二六以上，是用於軍事方面，此外約有百分之三五・六五，是用於調整各項行政與制度，實際用在生產與拓殖事業上的不過百分之三十。前二者固然非是絕對無意義，但由舉國債而消費在非直接的生產上，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必然形成很大的障礙，增加人民的負擔，減削民間資本的活動力。而昭和十一年四月以後的國債增大，更明顯的是大半用來擴充軍備，準備戰爭并用作侵略我國的用費。尤其

敵國債形將增加到百七十五萬萬圓的今年內，其軍事費約需六十五萬萬圓。此中由公債來支出的數目，則在五十五萬萬以上。所以百七十五萬萬圓的國債內，用於軍事方面的，也許要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了。

第三，我們要問日本國債的借主（即所有者）是些什麼人（法人或私人）呢？同時各種所有者所有的程度和狀況又怎樣？這些問題，我們可以由下列數字窺知之：

所有者別國債分配狀況表

所有者	昭和十年末所有額	百分率	昭和十一年末所有額	百分率
政府	二・五七・九六六千圓	二二・五	二・九一・六七千圓	二二・九七
政府關係	一八九・九六六	一・九	二二四・三五〇	二・〇六
共濟組合	四七・六四	〇・七	四七・六八四	〇・七
地方公共團體	四・三六二	〇・四	四・六一六七	〇・四
銀行	三二五・〇九五	三・二	四〇二・六六三	三・一七
信託公司	二二・八九三	〇・二	二二・六四一	〇・二
保險公司	二・二九六	〇・二	二・二九六	〇・二
其他	九・五八〇・八八九	九四・九	一〇・三五・二〇一	九四・九
共計	一一一・一六六	一〇〇・〇〇	一一一・一六六	一〇〇・〇〇

註（1）數字根據前引「時事年鑑」一八六頁

有又印者，大藏省證券及米穀證券不在內。又銀行中包含產業合作社中央金庫，信託公司中包含信託賬目。

註（2）昭和十二年六月末止所有額四・九八百萬圓。國債的所有者，主要的是銀行資本家，政府及其他私人等（小儲蓄者）

。銀行當然是第一位，佔百分之四〇至四十五左右。以昭和十二年六月末的情形來說，銀行所有四九八千萬的國債中，特殊銀行（如日本銀行及正金，勸業興業，台灣朝鮮等銀行是）佔一・三八三百萬圓，普通銀行佔二・五一六百萬圓，貯蓄銀行佔一・〇七九百萬圓。而銀行購買國債的資金，主要是存款。政府所有的國債，是由大藏省存款部運用存款部資金，（郵便貯金及其他政府收入款項之存款）來承受或購買公債而來的。所以主要還是靠人民的零星存款，（剩餘或積蓄）來購買的，政府所有，不啻就是人民間接的所有。

其他國債所有者，當然是一般收入有剩餘的私人，公債交易者及普通商店與商人。

因此，我們可以說國債的所有者始終是人民，不過在上列各種不同的所有者中，因其所佔百分率之不同，其所有的意義和性質即隨之而異。譬如說銀行（尤其是特殊銀行）所有國債過多，一方面表示銀行資金只運用於死的公債上；另一方面是說明公債的一般消化能力之減退。而政府所有國債的情形，亦與此相同。因的龐大的公債用「公募發行法」來募集，是難於一時達其目的的，所以目前日本發行公債，大概是用「承受發行法」即由日本銀行或其他特殊銀行及大藏省存款部先行承受，而後再轉向一般市場公開賣却的方法。假若一般市場不去應募購買，則大部份公債便要存留於日本銀行，（或大藏省存款部）的金庫中了。如此政府所有與銀行所有的公債額必然增加，而同時所存資金，已為政府提用，日本銀行發行兌換券的數額，必然非

增加不可，到此時往往會發生通貨膨脹的危險。

那末目前敵國政府所必須發行的鉅額公債，是否能不致專賴日本銀行或大藏省存款部之承受，而能普遍地散布到一般人民的手中呢？這又須視乎一般人民對公債的消化能力之如何而定。

（四）敵國人民對國債的負擔與消化能力

如前所述，日本國債既然一年比一年的增加，而在現在又是準備着大量的發行公債，這於日本國民的負擔怎樣呢？同時公債本身的消化有無可能呢？

我們先將過去日本國債加於每一國民的負擔，列表如後（註一）以說明之。

年次	各月未償還債	一人負擔額	利息一人負擔額
明治四十三年	二・六五〇・三五五千圓	三九・三六圓	一・七九圓
大正九年	二・七九三・五六一	四九・六六	二・三九
大正十四年	四・三二九・七三五	七〇・八八	三・五一
昭和六年	五・九五五・八一六	六三・七二	三・二〇
昭和十二年	一〇・五七四・五〇六	一〇五・六一	四・五一

（註一）數字摘自「時事年鑑」

上列數字，我們可以看出昭和十二年以後敵國民對國債負擔之不一。若以全國人口為一萬萬（連殖民地人口在內）平均每人須負擔百〇五元六角，而就國債利息一項來說，每人每年平均須負擔四圓五角。又若專以其內地人口七千萬來計，則平均每人約須負擔百五十一圓六角，利息負擔額為六・四四圓。但是，若以敵國人民所得與國債來

比較，則國民的重荷更爲顯著。

明治四十三年末的國民所得爲二・〇五〇・八四〇千圓，尙未到國債未償還額之多。大正八年末所得爲五・九一一・七七〇千圓，略超過國債未償還額之二倍。大正十三年末所得爲一二・八八二・七六〇千圓，約當國債未償還額之三倍。但昭和五年末國民所得爲一〇・六三五・七八〇千圓，平均每人所得爲一一五・八六圓，而平均國債負擔額爲六三・七二圓，約當所得之百分之五五。昭和十二年末的國民所得，無所根據，不知其確數，據一般推測，約爲百二十至三十萬萬圓之間。可是十二年度末的國債，也差不多是這個數字（見前述）國債累積額與國民所得總數的意義，雖不盡相同，不過就一國民各年負擔的利息來說，當然需要由該年所得中負擔之。例如說，昭和十二年末的所得爲百二十萬萬圓，則平均每人所得約爲百二十圓，這一百二十圓所得中，大約須負擔國債利息五圓之譜，即等於百分之四，因爲國債既是國家的債務，必然要國民來負擔它的。

過去的國債負擔已如上述。現在更來說明今後將發行的六十五萬五千七百萬公債的消化可能度是如何？

敵國在昭十三年度裏果然將這個龐大的六十五萬五千七百萬圓公債全部發行完了，那末，不管日本每一國民承受了六十五圓五角七分的公債券，同時也就是說每一國民要把他的全年平均所得三分之一拿出來購買公債，這是可能的嗎？

誠然，德國戰費等於國民所得八五・三%，以此推計，日本發行上述公債數，是可能而有餘裕的。然而，我們不會知道德國發行公債

之外，還濫發紙幣嗎？當時因物價高漲，實際所得減少，人民不是備嘗痛苦嗎？因此，問題的核心，不是在國民所得足以償付戰費之有餘與否，而是在國內一般金融市場能否消化這個巨額的公債，政府銀行能否不致於增發或濫發紙幣，促成惡性通貨膨脹，引起物價之飛漲，而威脅一般國民生計。

前面已經說過，去年度應發行的三十四萬萬圓公債，祇發行了十五萬萬圓。而且，此十五萬萬圓中，確實算爲由一般金融市場消化了的，不過五萬萬圓左右（日本銀行銷售二八七〇〇萬圓，銀行團購一萬萬圓，郵局零售六千八百萬圓。）其餘的都還留存在日本銀行的金庫中。公債消化能力如此不振的原因，我們可以舉出下列數點：

第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中產階級沒有豐富的購買力。因爲中產階級沒有豐富的購買力，而引起證券（信用）市場之極端的狹隘。結果，發行公債的大部份都集中在政府及半官性質的經濟機關手中，譬如一九三二年末國家內債有二九・七%，府縣公債有四一・三%，公司股券有二四・三%是在公立銀行，或政府機關手中，其他部份則在少數的銀行，信託公司及保險公司手裏。這足以證明日本的公債，從來就是停滯於銀行與公司的手中，找不到一般廣汎的市場，亦即是說日本資本主義的財政基礎之薄弱與狹小，而與其軍需工業的事業擴大與資本膨脹，根本上發生了矛盾。

第二，生產力擴充與資金的需要。日前在日本所謂的擴充生產力，差不多是指軍需工業的生產力而言。最近幾年來，日本爲準備世界大戰，對蘇戰爭，對華侵略戰等，新豫算計劃擴充的事業，大部份都

是有關軍事的部門，同時又獎勵人民擴張或創辦軍需品生產事業，所以軍需事業特別繁榮，而大部份的資金也用在軍需事業上去了。因此一方面促成其他事業的萎縮與減低生產，另一方面自然減少了投資於公債的實力。

第三，非軍需事業生產率之減低。因為軍需事業的擴充與需要資金，相對地非軍需事業即形疲弊，而尤其以最近日本國內物資的缺乏，非軍需事業生產率大多減低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且有每況愈下之勢。譬如說：去年十一月止，紡織業的生產額減少了五·二%，人造絲業減少六·二，五——五六·%，羊毛工業減低生產百分之六十。生產率之縮小，便是說明了利潤之減少，這當然萎縮了消化公債的能力。

第四，金融市場的緊迫。一方面是軍需事業之需要大量的資金與投下資金的不能收回，另一方面，非軍需事業亦須籌措資金以填補損失，因此金融市場發生了緊迫的現象，而在各銀行裏的存款及放款，亦均見減少（去年十一月第三週存款減少二千二百餘萬圓。）金融市場既日形緊迫，那裏還有餘力去儘量購買公債呢？所以日本銀行去年十一月以後，便到了這樣的地步：就是，一方面要求放款者增多，另一方面紙幣發行隨之而膨脹。（十一月末紙幣發行額增到十八萬六千萬圓，已超過了去年八月二十五日所規定的十八萬萬圓的發行限度。）

由於上述四點原因，去年度的公債，大部份就已經不能消化了。今年度的公債發行額比去年度差不多要增大一倍，可是金融不能消化

的幾個原因，不但絲毫未解消，甚且變本加厲的在全面惡化着。單就這點，我們已敢斷言，敵國政府公債市場的運用是很難於成功的。

其次，我們先來對日本資本家能購買公債的程度作一估量。日本資本家的總投資額（包含全國銀行及股份有限公司的已繳資本金）一百七十萬萬圓，（昭和十二年三月日本銀行調查）假定以戰時平均利潤率為百分之二十，（比平時增一倍）來計算，其一年的總利潤也不過三十四萬萬圓。這個總利潤額，除去一半移為蓄積資本，再投入生產過程中外，他如充當資本家們的奢侈的生活費也要提出一部份外，所能投資於公債的實際也不會超出十五萬萬圓。此外，從小儲蓄者的錢包中，充其量得到五六萬萬圓，合計公債可以動員到二十萬萬圓。（去年祇動員了十五萬萬圓）其他可吸收公債的方法還有：（一）提高公債利率或削減售價（在票面價額以下）；（二）強迫大銀行購買，限制股息；（三）提高愛國心理，吸引郵政儲蓄銀行存戶之零星資金；（四）促成軍需工業資本家之購買公債等。這些辦法中，第一種去年曾經試驗過，成績不見甚佳。其他三種究有多少效果亦屬疑問。而且，不自然的強制方法，不唯不足以達成推銷公債之目的，反足以危害整個的國民經濟。因此，今年內應發行的巨額公債，遠非一般金融市場所能消化，更非敵國人民所能負擔得了的。何況日本國民的負擔，除了國債之外，還有十五萬八千餘萬的市公債，九萬七千餘萬的府縣公債（一九三七年六月止）。這些公債，每年應償還的本利，其數亦不為少。故其結果，祇有增債紙幣的辦法而已。

（五）結論

總上以觀，日本最近十二個月內將發行的六十五萬萬元公債，能消化於一般金融市場及民間的，最大限度約為二十五萬萬圓，此外的四十萬萬圓，祇有靠日本銀行與大藏省存款部的承受，用增發紙幣的方法來解決其政府對軍事費的支出了。退一步說，這四十萬萬圓的公債，雖不致全部或一時以增發紙幣來運用，可是相當數的紙幣增加於市場，是絕對無疑的了。據蘇聯塔甫氏的估計，日本政府在戰時第一年内，要想動員民間工業的積蓄，一部份軍需工業的設備，及國富中供戰爭所用的物件，至少須發行四十萬萬圓的紙幣（見「日本作戰力」二二八頁）。可以說今年中敵國內紙幣之膨脹，也許至少會達到這個數字的。就算是紙幣的發行，祇達此數字，不致更充斥，已經比現

在增加了二倍有餘，可算是相當的通貨膨脹，且帶有險惡的性質了。通貨膨脹，若一至於此，那時的物價必然要高昂到二倍以上或者三倍，國民一般生計費也必然要提高，而感到極端的苦痛了。物價暴漲，生計困難，一般購買力因而低下。斯時，和平工業生產品，必然銷路不振，根本會影響到它們的存續問題，至少大部份也祇得減產或關閉了。所以整個的國民經濟，在公債增發以後，至少是會減縮，會呈現極度的恐慌的。在平時已經很脆弱的日本經濟戰爭相當延長後就是說，在發行二十五萬萬圓公債的第一年以後，日本經濟雖然不一定會崩潰，或整個的破壞到不可收拾，但是絕對避免不了動搖的。

一九三八，五，二十四。脫稿

由雲南日報說到今後新聞政策

瑞甫

美國新聞學家費遜(Thomas Jefferson)說：「我情願居於有報紙無法律的國家，而不願居於有法律無報紙的國家」。這已經闡明新聞事業的重要。新聞事業是一種近代文化的產物，在歐洲，至十六世紀，英荷德法等國始創所謂「新聞信」，一六一六年荷蘭亞姆斯德丹出版了一種有插畫的定期新聞信，名曰「週報」(Nieuwe Tijdingen)

165
，這是世界最古的報紙。我國具有近代化意味的報紙，則始自一八六五年創刊之華字日報(香港)，繼之有一八七五年的申報(上海)。

近年以來，雖有長足的進步，惟仍遜歐美及日本遠甚。自去歲抗戰以

後，文化事業在平津京滬幾完全為暴敵所摧毀；新聞事業亦遭厄運。後方新聞界的職責，因此加重加深。近人喻報紙在抗戰中的力量有如「紙彈」，可知當前新聞界的使命是怎樣的重大。作者謹將雲南日報的概况加以累述，並進而論及現階段的新聞政策，以為關心西南新聞事業者的參考。

雲南日報的概况

雲南因地理環境的限制，交通的梗阻，一般的文化事業是落後的。報紙亦不能是例外。發行現代化的報紙是晚近數年間事。雲南日報

是在三年前（民國二十五年）文藝復興的五四運動紀念日創刊出版的。最初自然是諸事都簡陋的。我們同人在黑暗中摸索，在困難中掙扎。漸漸地始略具雛型。直至今日，仍在克服困難中邁進，以期逐漸盡到指導輿論，報導新聞，宣揚國策，完成「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新聞界應負的使命。

組織

雲南日報社的最高指導者是董事長，由常務董事指導進行社務。社設社長，負全社對內對外的全責。社長下分設編輯，採訪，經理三部，每部分股從事實際工作。

最初這個報紙的體質是這樣的：每日出版兩大張。內有社論，國內電聞國際電聞，及滇省省市新聞。計各佔兩版。副刊計有八種：現代公民欄，地方教育欄，大眾學園欄，鄉土史地欄，醫藥衛生欄，星期茶話欄，市政週刊欄及南風欄。南風每日均發表；各欄均佔一版篇幅。其餘每日出版一種。自去歲抗戰以來，紙張來源困難，而價值甚昂，又因銷數激增，賠累甚鉅，遂將篇幅縮減為一大張。篇幅雖減，反而緊湊了編排；選稿標準也精密化；言論也充實化。

社內工作

誰都知道：社論是報紙的靈魂。在抗戰建國的前提下，新聞界指導輿論，宣揚國策的成敗，全恃言論的公正，健全，進步與否以為斷。雲南日報同人，對這方面十分注意。我們的態度是佔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對時事問題，作建議的，公正的，客觀的解釋與評論。不矜不奇文的評論，也避免陳腐空疏的套語。雖說成就有限，大體總依此

綱領做去。其次，說到電訊編輯，此雖是彙集同性質的電聞消息，製作標題，工作似易而實難做到精妙處。雲南日報標題的技術，由各別標題進而至綜合的標題，棄抽象而重實體，力避重出復現的毛病，以期減少讀者的閱讀時期，增加新聞的報導價值。近月以來，抗戰軍事緊張，國內外電訊倍增重要。本報消息均採自中央社電聞，另於香港增派專人拍發專電；於抗戰重心的漢口，增設特約通訊員，常用通訊，報導前方消息。省市新聞，則廣佈通訊網。外縣的通訊網，業經設置在九十餘縣區內。南風副刊偏重文藝，過去因選材雋永，思想進步，頗能得到大多數青年的同情。其餘副刊，偏重學術研究，對於邊省文化事業，略盡一點一滴的灌溉工作。抗戰以還，星期日增出一星期增刊內容包括學術文字，富於雋永有趣的「星期茶話」和星期「畫刊」。後來因報社另發行「新動向半月刊」，而將星期增刊停刊。

說到經理部方面，工作偏重營業與發行。著重深入普遍，謹守商業信用，並力求遞發敏捷，由創刊一千份，不一年而推銷至一萬五千份，證明讀者是愛護這個報紙的。遠如越南暹羅，緬甸，近如黔西盤江及川西會理一帶，都有雲南日報的大批常期訂戶。

我們的缺陷與困難

雲南日報社的同人，隨時隨地自我檢討我們的工作。我們發現許多的缺陷和困難，這缺陷和困難，有的是我國新聞界同業所共感的；有的是我們特有的，我們與同業所共感的是：（一）紙料來源的稀少和價昂，新聞紙在滬港各地，平常每令（五百張）不過國幣四元一五元。在雲南的價格常在十五元左右。相差三四倍之多。雖然較漢口市

價每令國幣二十元又減一倍，滇省文化印刷事業不能自給自足的發展；這是一個重大原因。以本報而論在出版每日兩大張時，單紙價已合國幣三分。然而售價每月僅爲六角。並成本亦不能收回，因銷路的激增，致報社賠本甚鉅，若增高售價，則又違悖深入普及之旨。這是經濟上感受最苦痛的原因。現在每日出版一大張，虧空較少，但社內同人手胼足胝地辛苦，在最低待遇之下，做最大效率的服務，也够吃力了。(二)印刷上出版上更是使讀者感莫大的不便，而本報所親歷的苦痛更深。滇省公私印刷所所有的，完全係舊式平版機，每小時僅能印一千回。爲什麼不用新式捲洞機呢？因爲過去文化事業不發達，無此需要。近年本報發行增至萬五千分，因此舊印機不能滿足需要，而出報時間因此延長。近雖力求改進，尚未做到晨刊的發行，殊屬遺憾！至於校對時有錯誤，字跡時有模糊，都是缺陷。這些缺陷，都用全力逐漸克服，(三)報紙之能負指導新聞，指導輿論，宣揚國策，促進文化等工作，半靠報紙本身的努力，半靠社會的同情與培養。尤其在言論方面，要成爲健全，公正，有力的輿論，更不能離開社會的扶植，誅奸伐惡，明是非，辨真偽，在在均與社會上惡勢力腐勢力相衝突，苟非社會公正態度，予以有力的扶植，則報紙本身即難克服困難。新聞界的言論，須得注意環境。過去在抗戰前，新聞檢查統制的人未能有效的扶植報紙，成爲普遍全國同業發展的致命傷。在今日抗戰第一的使命下：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國策，一個領袖的說法，成爲戰時文化界的最高指導原則，我們是跟著這原則行動的。

現階段需要一個確定的新聞政策

由於敘述雲南日報的概況，因而聯想到抗戰時期的我國新聞政策，當此「國難之險，險於覆舟；應戰之急，急於救火」之時，報紙的「紙彈」使命，須與抗戰建國工作，發生密切的聯繫。要使新聞事業就其固有使命下，盡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責任，則對新聞事業本身的發展與夫新聞事業外延的環境勢力的培養，均需要政府社會與新聞界共同協作，指臂相顧。至少要注意下列各點：

(一)政風的培育，新聞事業指導輿論，報導新聞；同時社會和政府又指導新聞事業，供給新聞。以前往往雙方互不協調。而中國政治與社會的不進步和中國新聞事業的落伍，則政風的未曾做到健全的培養，實爲主因。社會無是非的裁判，因此不能形成健全，正確的輿論；政治不以民族利益爲前提，因此不能形成良善的政風。抗戰以來，政府，社會和新聞界，均有大的覺悟。民族團結的精神，彌漫全國，象徵著偉大光明的前途。新聞界雖在華北，及沿海一帶受敵人的武力摧殘，但在華中的漢口，華南的廣州香港，和華西的重慶，昆明發達起來。新聞界先有進步的思想，民族的意識，科學的訓練，方能以言論促成良善的政風，奠定戰時及戰後現代化的國家文化基礎；同時政府和社會也要同情的培養和尊重新聞界言論的獨立精神，風氣所趨，民衆意向始獲得表現與歸宿。

(二)國際宣傳的促進。現在我國的中央通訊社，雖成立年代不久，却已成爲中國唯一大規模的通信社。因爲該社是政府所辦的，不但擁有報道政府消息的特權，以及使用電信機關的特殊便利；而且還跟哈瓦斯，路透社，美聯三大通信社訂立專約交換消息。然而這工作尚

覺不夠，尤其在抗戰時期，前幾天巴黎舉行反侵略反轟炸無防禦城市大會，總會電請中國供給敵人殘暴行為的寫真片。我們爲什麼不自主的早日向國際供給這類照片呢？這不是笑話麼？我們即使無力做到像路透社那樣的宣傳網，至少也應積極的謀國際宣傳的擴大與國際情報的敏捷化，秘密化，敵國軍部設有國際情報的專管機關，每年預算只在軍事費之下，外務省的情報局尙不算在內。而且那同盟社的宣傳網，多麼可怕！要想喚起國際人士對抗戰同情與援助，要想我國外交政策和行動不落空疏，則政府與新聞界對國際宣傳工作是值得埋頭苦幹，立起急迫的。

(三)新聞人才的培養。中國最古新聞紙，遠溯於春秋一書，唐宋的官方的邸報，宮門抄轅門抄之類已是用木刻記載政事。一八六五年的香港華字日報是洋人創始的，固無所謂新聞人才的組織與訓練。晚近十年來始有新開教育，如上海復旦大學，北平燕京大學設有專系。而新聞界先進如史量才，邵振青，張熾章，戈公振個人的努力，亦有足多者。然而我國的新聞事業無論質量上仍睜乎外人之後。全國最大最老的報如申報，新聞報，大公報，銷路均不過十五萬份。比諸世界三大報，芝加哥論壇報，紐約時報，大坂朝日新聞之銷百萬份者，直

落後一世紀。新聞人才的缺乏，實爲吾國報業落伍原因之一。人才非自生自長，主要全靠培養。「記者是學者，學者是記者」，所以，新聞人才的培養要以學校專門教育出身者爲最大量之培養機關。理想的新聞人才（內勤與外勤）須有優良的品性，健康的身體，獨特的卓識，敏活的頭腦。且不僅熟諳新聞之採訪與編輯，並須富有新聞學以外的普通知識。現在培植新聞人才的大學，已受戰禍。後方高等教育機關，似應注意及之。

(四)新聞檢查的限度。新聞檢查，在政府立場自有其存在的必要，惟檢查方法與檢查人選，則大堪研究。昔日新檢與報紙常立於對立衝突的地位。如數年前蘇州各報曾因反對新聞檢查而一致停業，即係顯著之一例。此係往事不必再提。在抗戰期間，政府工作以軍事第一。自須統制新聞，但在喚起全民共同參加戰鬥，激發國民同仇敵愾心，宣揚國策，暴露敵人暴行，諸使命上，政府應開文化動員之門。在不違悖國策之下，應予新聞界以完全自由發展之機會。一年來文化界的活躍，後方報紙的激增，已是言論界進步的象徵。我們誠懇希望全國新聞檢查機關，在法令許可內，予新聞事業以發展機會。勿多方留難，須合衷共濟，以度此「險於覆舟，急於救火」的抗戰工作。

評章元善『合作與經濟建設』

方顯廷

經濟建設，經緯萬端，蔣委員長於二十四年四月一日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時，曾列舉振興農業，改良農產，保護礦產，扶助工商

，調節勞資，開發道路，發展交通，調整金融，流通資金，促進實業等項，爲經濟建設之要端，合作組織，雖未被列入，然其與經濟建設

關係之密切，則不容否認。蓋現代經濟制度，除建立於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三者之外，尚有以合作為建立之基礎者，如丹麥合作共和國，即一顯例。章元善先生近著的「合作與經濟建設」（藝文叢書之一、漢口藝文研究會出版）雖未擬以合作主義，為我國經濟建設之基礎，然曾切實作以下之聲明：

「在我們中國，合作事業是整個建國事業的一部份。我的責任，自然應當集中在合作。可是那整個問題的存在，始終沒有離開我的意識與視綫。我為整個問題而談合作；正因合作與整個問題有極密切的關係。」（自序）

本書著者，為我國合作界先進。自先總理以至薛仙舟，戴樂仁，陳果夫諸先生，對於合作之提倡與宣傳，雖有不少的努力與貢獻，然置身合作社之組織與推廣，二十年來如一日者，當以章先生為第一人。誠如章先生所謂：

「我與合作事業，結緣有年，許多事實的產生，我自己往往就是『始作俑者』」

章先生是蘇洋義賑救災總會（下簡稱義賑會）合作事業之創辦人，亦為我國中央合作行政——前實業部合作司——之首任主管長官，我國合作事業，為史已近二十年，然初期十餘年間，合義賑會在河北省所主辦之合作社外，其他各省對於合作社之組織，幾寥若晨星。殆民國二十年，我國一方受世界經濟衰落之影響，一方因江淮大水災及剿匪之結果，農村經濟，幾瀕破產之境，合作組織，仍如雨後春筍，而被視為復興農村之不二法門。其時合作社之得迅速推廣，由江浙而

豫鄂皖贛等省，章先生實與有力焉。其時章氏以從事義賑而發明所謂互助社之組織，為正式合作社作初步之準備，於是合作組織，始得蔓延全國，即邊陲省份如陝甘等省，亦有合作社之組織。以章氏在我國合作界之成就與地位，出而執筆為文，寫成本書，在此抗戰期間，實為文化、難得之創作。

本書分（一）概論，（二）吾國合作事業之既往，（三）使命，（四）設施方針，（五）法規，（六）分類及系統，（七）合作社經濟，（八）兩個感想，（九）關係問題，及（十）檢討及最勉十章。書後復殿以附錄八種。全書在三五萬言之限度內，不僅將我國合作事業之既往及今日之典章制度以及技術問題，作一簡括的介紹，且將合作與政治體系之關係，以及可期之效果，予以明析之分析。茲請按章摘要敘述如次：

第一章概論，分學理及各國的合作事業兩節。對於合作之定義，效用及其在各國分佈之實況，有詳盡之敘述。對於合作定義，因過事通俗化，則不免失之籠統。如謂：

「合作定義，說者不同，抽象的說：一個人羣，為滿足共同感覺到的需要而合作，換言之，合作是人們滿足彼此都感覺到的需求的一切行為。」

則吾人因需要政治組織而共同產生之國家，若亦稱之為合作，似不甚合乎情理。或謂：

「再抽象一點的定義：是被環境所束縛的人們，要想跳出環境，基于這個動機而形成的一切活動，便是合作。」

亦有太泛之感。蓋合作組織，誠如章氏所言，在倫理方面，俱有啓發自動互助之美德，在經濟方面，俱有合力合理之優點，定義若太簡括，則不免義有未盡之處，而易滋誤會。

第二章論吾國合作事業之既往，分概況與數字兩節。吾國合作事業之發展，爲期雖僅二十年，然已經過四個時期。民七至民十二爲萌芽時期。此一時期因學者如薛仙舟等之提倡，合作種子已散佈於若干都市中之學校及職工團。民十二至民十七爲試辦時期。此一時期之中國合作，已由宣傳提倡，進而爲有計劃之試辦；由都市學生職工之嘗試而深入於閉塞枯寂之農村；由學者對於學術之熱心與興趣，在切心感覺其需要之廣大民衆中實地推行。義賑會在此時期內，基於救災不如防災之信念，在河北省推行合作，頗著成效。惜政府不予同情及協助，致其他各省，未能聞風興起。章氏既爲義賑會合作事業之創辦人，對於本期內合作事業發展之認識，自更澈底。此時期內，「河北省之合作事業，確能表現劃時代之進展。不僅區域與數量日見擴大，而社務業務乃至指導訓練，亦漸具規模。今日舉辦合作事業之方法，大都取法於此。」民十七至二十四年爲推廣時期，此爲中國合作，由民間倡辦運動，進而爲政府積極提倡之時期。在此期內，中國國民黨列合作爲七項運動之一，中國合作學社成立於上海，各省市頒行合作社單法行規並組織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或類似之機關，以主持省市合作行政。同時商業資本，鑒于都市游資之充斥，始利用合作組織，開始向農村投資。本期初期，江浙兩省，在黨政當軸倡導之下，合作組織，進展甚速。殆民二十年，義賑會因江淮大水災而奉令舉辦皖贛農

賑，積互助社即合作預備作爲推廣正式合作組織之先聲。二十一年行營奉 蔣委員長命，相繼在豫皖鄂贛剿匪省份，普遍的推廣合作組織，以爲實施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政策之張本。民二十二年華北戰區救災委員會成立，辦理冀察農賑，合作組織，遂漸見普及于義賑會足跡所未及之冀東及鄰近之察省。民二十三年全國經濟委員會復以五十萬元辦理江西合作事業，以四十萬元辦理西北合作事業，於是邊陲省份如陝西省，亦漸見合作社之組織。因合作社之日見普及，合作法規與行政，益感有統一之必要。二十三年立法院通過合作社法，二十四年修正營業部組織法增設合作社司，本書著者，即被命爲首任合作社司長，懇懇就熟，於是中國之合作事業在中央行政方面，始得一雄厚之力量，以爲進展之助矣。民二十四年以來爲政府設施時期。此時期內，政府成立合作社司，頒行各種合作法規，改組四省農民銀行爲中國農民銀行，營業部成立合作專款保管委員會並創立農本局。廣濶橋事變突起，合作組織同受嚴重打擊，本年元旦政府改組，中央合作行政移歸經濟部農林司主管，廣續進行。此二十年來我國合作事業進展之概況。作者爲合作事業之保母，故敘述不嫌詳盡，取材更多由個人經驗得來，本章之精彩，亦率由於此。

第三章論使命，謂「合作社之推行，可使人民有組織，生活改善，提高農村文化及其經濟地位，增加生產，利用土地。農民購買力強，工商業因之勃興。農民知識發達，民主基礎因之樹立，合作社是一種工具，一把鑰匙，有了他農業可以應用最新的科學；農村可以接受大量的投資；農民可以享受開明的生活。」作始也簡，將畢也鉅」

。合作在吾國現階段的使命，是特別重大的。」章先生爲我國合作之引導者，對於合作之使命，自甚重視，而關懷亦綦切。是以處此國難日趨嚴重之期，因我國合作事業基礎之薄弱，以致表顯之成績亦甚微薄，其失望自也更鉅。故在檢討與最勉章（第十章）內會謂：

「在中國，合作已有十七八年的歷史。但至於今日，似乎並未發生什麼效果，不會將我們目前遭遇的國難減少一分，這是無可諱飾的事實。凡會參加合作事業的人，一而感覺失望，同時更應自愧。雖然有些合作購置公債，捐送慰勞品等，已覺難能可貴，但就那整個國家需要來說，還是微乎其微，算不了什麼，絕沒有產生我們以前所預想的結果！」

第四章論設施方針，章氏根據二十年來辦理合作之經驗而發言，自屬更見切要。我們民衆教育尙未普及，民衆組織不甚健全。欲賴民衆自動之力量，出而組織合作社，不啻緣木而求魚。我國合作運動之歐西各國如英，德，法，比，丹等國合作運動之異點，不外乎民衆之不能自動組織。是以我國合作之發軔，初賴社會團體如義賑會之倡導。殆國府成立，政府始以一貫的政策，推廣合作社之組織。雖然，自動與被動非絕對而相對，如何由被動階段進而爲自動階段，當由輔導機關如政府或社會團體負促成之責。章氏對此，故謂：

「不是農業社會的人，對於農民的合作事業，是站在領導的地位，因爲他們不能動，不會動，然後才推他動。有許多人，認錯題目，以爲辦合作的人，自己便是主人，這實在是錯誤的。從事於鄉運的人應當是越作事情越少，引導人民自動，這自動力愈大，

領導的需要愈少。……華洋義賑會十數年來的事業：就是如此，範圍是愈作愈小，事情也愈作愈少，而運動的力量却一天一天的進展。所以辦合作的人首先要認清合作的主體，是老百姓，并非辦合作的人們。」

第五章論法規，對中央所頒佈各種合作法規，自合作社法及同法施行細則以次，列舉無遺。多數法規，且爲章氏身任合作司司長時期所手訂。

第六章論分類及系統。合作社之分類，依照前實業部發表之「劃一合作社名稱說明書」。凡合作社經營某種業務之一部者，用其業務性質之名稱；業務性質太廣者，并列其物品之名稱。以期界限明當，切合實用，至業務種類，根據二十五年五月修正之合作社法施行細則第五條及上述「劃一合作社名稱說明書」，分信用，供給，生產，運銷，消費，公用及保險七種。合作系統，指行政，促進，金融，合作社系統等。合作行政包括登記，法令解釋，受理訴願，以及法令之擬撰與修正補充各端。其主管機關在中央爲經濟部，在各省爲建設廳，在各縣爲縣政府，在直隸行政院之市爲社會局。但其省政府如設有合作委員會等專門機關之省份，則行政責任暫由該機關等代爲履行。「促進」一詞，係指宣傳，組織，指導與協助四種工作而言。政府促進合作事業，其責任由行政主管機關負之。各省之合作委員會大部工作，在辦促進事項，行政反處於次要地位。在辦農賑之各省（湘鄂皖贛），自二十五年七月間移歸政府自辦後，現尙在經濟部指揮中，此爲中央機關直接在各省辦理合作之特例。正統的金融系統，在最高級之中央

，有中央合作金庫，省有省金庫，縣有縣金庫。在目前我國合作社本身體系之建樹，尙未完成以前，政府專爲供給農業資金特設中國農民銀行與農本局，在各省辦理縣合作金庫。合作社系統，從縱面言之，爲單位合作社，區聯社，縣聯社，省聯社及全國聯合社，從橫面言之，爲信用，供給，運銷，生產，消費，公用，保險等七種。合作社之聯合，自應分別組織爲七個系統，將來每種業務俱有一個全國聯合社。然誠如作者所言：

「各地情形不同，事實上欲求此整齊劃一，實亦未易實現。故在齊整劃一之法定系統中，應予以適切活用之途徑。各種業務需要不同，在某種情形之下，聯合社之組織，已有區聯社之組織；或已滿足，即無再組織縣聯社之必要。因事實上常有聯合範圍過大，業務經營反感不靈便之弊。縣聯社之與省聯社，省聯社之與全國聯合社，情形亦復相同。故聯合社之組織，達到某一階段即可無需再行聯合，應視事實上之需要而定。其在特產區域內，復得以其特產之區域，爲其聯合之基礎。既不必受行政區域之拘束，且得破除分級（如區聯，縣聯）之規定，有關之合作得依業務上之便利，組織「區際」「縣際」或「省際」聯合社。」

第七章論合作社經營，分社務，業務，組設合作社之要件及附屬事業四節。「社務」「業務」爲經營合作常之兩大支柱，據作者之定義，「凡關於合作社之組織訓練監督等等手續，而爲一般合作社之共通的，基本條件者，俱屬於社務。其對準組織之經濟的目標與活動的範圍，而從事於技術上之工作者，應屬於業務。概括言之，凡維持合

作社組織之一切工作，謂之社務，凡爲達到組織目的而從事之一切工作，謂之業務。」社務與業務就其關係言，如一體兩面；就其作用言，則又權能分開。社務屬權，故對於業務，負促進，審核，監督之全責。業務屬能，故應在社務執行者之指導與監督下，邁進其進行業務之技術的工作。由此可以認識社務爲合作社之基礎，業務乃合作社之上升建築。欲求業務之發展，首需謀社務之健全。組設合作社之要件，分原則的與法定的兩種。原則的要件，第一，合作社的組設，應出於人民的自動。第二，合作社業務的選擇，應由人民依據客觀的環境或實際的需要而確定之，俾每個社員均能獲得實惠。附屬事業，多俱有非經濟的或社會的性質。蓋合作社，不僅有其經濟的效用，且有其社會的效用。農村中因有合作社，空氣從沉悶枯燥，一變而活潑振作。惡習慣不能存在於合作村中，戒烟，戒酒，息訟等運動，均得藉合作社之存在而一一舉行。同時年終演戲祝神，有的村子即可變更計劃，乘此農閒作業之時，舉辦講習所，合作宣傳週，識字運動等公益事業。

第八章述作者的兩個感想。第一，基點要認定。我國指導合作運動人士，紛紛以合作以外之動機，從事於合作社之組織，對於合作社本身，不惟毫無裨益，且多妨礙進展之處，此種人士，誠如作者所言：

「他們的動機不一，各以各的立場爲主觀。有的爲實驗學說，試驗技術或訓練人才，有的爲推廣農業；有的爲救濟災荒；有的爲奉行 總理遺訓；有的爲宣傳宗教；更有爲放款做生意，甚至拿

合作來掩護謀利的企圖，或為自己找出路，還有盲從趨時的，形形色色，好幾十種正當與不正當的動機，在那兒推動着這些人們分頭進行。」

所謂認清基點者，即指「指導的人們，應當認清合作社是人民的組織。自己對於合作事業，不論把有什麼希望，應當自始至終以局外人自居，完全用客觀的態度，來做他的指導工作」。而「設社以前的指導，應當為合作而合作，為合作社而組織合作社。拿人民感覺着最需要的問題先來解決。農業推廣等等，都應在合作社成立之後，漸漸辦理。」第二，怎樣開始。合作指導人員，於開始提倡合作社時，先應認識合作之使命，熟識一切關於合作的法令及政策。此外尚有應行注意之四點，即（一）應當引發人民自動的能力，（二）認識推行合作需要充分的經驗，（三）應當知道合作社是一種組織，充其量不過是一部機器，須要充分的資本，忠實有為的社員，健全靈活的組織，經營的人才，纔可運用自在，發揮其效能，（四）須知建設不只合作一事。教育，衛生，自衛……等都是建設，都應發展。

第九章論關係問題如（一）鄉村建設運動，（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三）合作社修正案，（四）農業倉庫，（五）合作會計制度，（六）合作教育，（七）互助社及農賑，（八）農村副業及（九）非常時期工作等，信筆寫來，頗能嬌嬌動人。

第十章之標題為檢討與勉勵。作者對於我國合作事業在抗戰期中未能發生預期的效果，有沉痛及深刻的批評。特別以作者所手辦之河

北省合作社，自戰事發生後，雖成立十餘年歷史之舊社，也都不免陷於停頓狀態中，感覺失望。致其所以不能發生預期的效果之原因，約有下列六個：（一）政府注意合作事業，乃是最近的事，（二）合作事業的經濟力量太薄弱，銀行對合作社投資，係最近的發展而為數亦甚有限，（三）政府對合作缺少一貫主張，因此學校銀行及社會團體的步驟雜亂不堪，各方面的努力，遂有不相長而相消之勢，（四）合作事業中的人力，過去也欠充足，辦理合作的各機關，僅以合作為其工作的一小部份，即以義賑會而論，用在辦理合作方面的錢，僅及其支出總額的百分之五左右，（五）過去農業衛生，教育金融等機關，往往不去利用已有的合作社，而為特殊目的自去組織合作社，結果兩方都不發生效用，（六）我國合作的基礎不堅固，雖然在數目上將近四萬個社，但有三萬五千以上都只有五年以內的歷史，合作社不够普遍，合作基礎還是薄弱的很。

最後，章氏根據個人經驗所得，列舉合作事業有本身修養之必要條件十種，以為勉勵。其對於公私之分野一條，尤多精到之處，因引述之，以殿本文，且為讀者勉也。

「善惡之分野在公私之具體的表現，得從「個人」與「機關」事業」三方面觀察之。今有人焉，處處以事業為重，機關次之，個人地位又次之。設不幸而遇有阻礙，則甯犧牲個人，以求保全機關。萬一尤不能解決，則更退一步，甯犧牲機關，以求保全事業。夫是之謂公謂善，反是者為私為惡。」（完）

編輯後記

西南聯合大學商學系主任丁信先生曾著有中國煤業棉產及其他工業調查若干種，由南開經濟研究所出版。他這篇關於錫業的研究，後方實業界人士，尤宜一讀。

王翰愚教授的「外交與統一」是續前期的。他對本題的詳盡發揮，予我們以戰時應有的根本認識。

馬季唐先生是一位對日本經濟素有研究的學者。這篇敵國國債的分析，是切實難得之作。我們希望他不久還可把本題最近兩月的發展，為大家闡述一番。

方顯廷先生是國人盡知的經濟學權威。南開經濟研究所在方先生與何廉先生領導下，已成中國經濟學界的異采。他現在貴陽主持中國農村建設協進會事。百忙中寄來一個長篇的書評，我們感謝得很。

請看

雲南唯一大報

雲南日報

言論正大

消息靈通

報道正確

紀載翔實

編撰精彩

版式美觀

銷數最多

廣告效大

社址 雲昆南明市文廟橫街東口

本報價目

本市
一月國幣六角
半年國幣三元二角五仙
全年國幣六元

國內
一月國幣七角
半年國幣三元七角五仙
全年國幣七元